觀察

第四卷上冊合訂本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五日重印

THE OBSERVER
三十五年九月一日創刊

觀察

•逢星期六出版•　三十七年二月廿八日　•售一萬五千元•

第四卷　第一期

專論

政治上的自由主義與文化上的自由主義　張東蓀

雖然對立不見得就有戰爭　周炳琳

外論選譯

歐洲與美援　Victor Perlo等

新德里通信

甘地之死　嚴紹端

甘地與新印度　嚴紹端

從戰局看政局（觀察專稿）　觀察記者

觀察通信

陝晉戰局與胡宗南部　觀察特約記者

淚眼看東北　觀察讀者投寄

北平學生又被捕　觀察特約記者

週末閒欄

世界之兩極化　何永佶

通信

關於「日本復興會不會威脅中國」　費孝通

書評

國民所得　陳振漢

發行者：觀察社

社址：上海(5)北四川路一九七二號內一號
電報掛號：590027

訂閱價目

（三個月）
平寄：十五萬元
掛號：十九萬元
航平：二十三萬
航掛：二十六萬

（六個月）
平寄：三十萬元
掛號：三十八萬
航平：四十六萬
航掛：五十二萬

郵資漲價請補繳
國外：全年美金六元

觀察合訂本

第一卷上册　有售
第一卷下册　再版中
第二卷上册　有售
第二卷下册　再版中
第三卷上册　有售
第三卷下册　裝訂中
售價：每册十五萬元
郵費：掛號每册五千
航掛每册七萬元

廣告價目

封底套色一千八百萬
普通
全面一千五百萬
半面八百萬
1/4面四百五十萬

退稿附郵

平退：附郵五千元
掛退：附郵一萬元
航掛：附郵一萬元
航掛退：一萬五千元

讀者投書

遼陽之失

編者先生：遼陽終告失守。這消息是由官方報紙在二月九日發表的，謂守軍已於七日轉移陣地云云。據由遼陽逃出的難民說，共軍炮火猛烈，攻城的兵力超過國軍六倍之多——有六個縱隊。一月卅一日，遼陽郊外村鎮便有小接觸，當共方發覺守軍兵力薄弱不足一萬時，便由四日起，集結兵力，展開攻勢。炮火異常猛烈，國軍所據城郊工事完全被毀，不得不退守城廂。共方繼續以炮火向城廂發射，東關及南關一帶民房大部燬於炮火，老百姓死傷很多。守軍曾一再向瀋陽求援，然當時瀋陽郊區二三十里一帶的地方，如蘇家屯、東陵等處，時常發現小股兵力的竄擾，而且共方早就喊出到『瀋陽過年』的口號，這也許是神經攻勢，可是國軍方面恐怕「顧彼失此」，瀋陽區畢竟較遼陽為重要，所以遼陽未能得到援軍，受不住重大壓力便失守了。共軍是在舊曆除夕正式進佔遼陽的，進城後對守軍尉官以下的兵士，欲回家者各發二千元邊幣遣散，老弱殘兵則概不收留，校官以上的軍官押送共軍後方受訓。攻打遼陽的兵力據說是最精銳的，兵士多半是強健的山東大漢，裝備也很整齊。

遼雲嵐　二月十七日　瀋陽

競選費用的統計

編者先生：為了選舉「國代」「監委」和「立委」，全國各地整整地熱鬧了三個多月。競選者，花樣百出，各地報紙雜誌，已有不少報導。

三種當選人名額，一共三千多名。競選者約有八千人，每人直接和間接的花費平均十億元，總數就是八萬億元（八字底下十二個圈，一個天文學上的數子）。假使把這一筆錢換成一元一張的法幣，它的

長度：可以圍繞地球三萬圈

面積：可以鋪滿整個的浙江省

體積：可以把整個的上海市區埋在鈔票堆裏，只有極少數的尖塔露在外面。

重量：八百萬公噸（所需要的運輸工具是萬噸自由輪八百艘，或火車二千七百列，或大卡車二百六十萬輛。）

假使把這一筆錢拿來做別種的用途，它的效果是：

如果用於建軍，可以購置：

戰鬥艦二艘或
航空母艦三艘或
巡洋艦六艘或
驅逐艦二十艘或
潛水艇十五艘或
飛機五百架或
戰車五千輛或裝備
機械化兵團四個

如果用於加強運輸，可以購買：

輪船四百艘或
火車一百五十列或
汽車三萬輛

如果用於建設，可以修建：

從上海到北平的鐵路一條或
從上海到迪化的公路一條或
優良的海港兩處或
巨型水力發電廠兩座或
小型發電廠和自來水廠一百座（可以使一百個城市的市民享受到水電的設備）或
生產民生必需品的工廠一百五十座或
灌溉十萬畝的農田水利工程一處或
相等於上海百老匯大廈的房屋八十座（可以解決房荒，杜絕以金條頂房屋的陋規）

如果用於救濟方面，可以：

使全中國十分之一的人民每人有一套衣服穿或
使全中國一百分之一的人民不必工作而坐吃一年

現在選舉的主潮已經過去，喜者自喜，悲者自悲，但是當事者誰又體驗到這是多大代價的一筆浪費呢？

何少逸　一月廿七日　台北

徐州亂抓壯丁

編者先生：徐州已成恐怖世界了。近接徐州親友來信：『從十八號就開始抓壯丁，直到現在還是抓，抓，抓得烏烟瘴氣，哭叫連天。這一次「徵兵」並不按照法定手續辦理。既未宣布名額，也不舉行抽簽。不問免役緩役，也不論弟兄幾人，更無所謂是否「中簽」，就是不分皂白地亂抓一氣。凡是十八到廿五歲的小夥子，正合所謂「黃巢殺人八百萬，在數一人也難逃」。而且是三更半夜地抓。西關有一家，新婚的晚上，新郎被抓去了，新娘跳河自殺。「徵集處」只見年青人捉一批，放一批，誰也不知那天才足額。保甲長們藉故大事勒索：但如用些錢，便有人可以保鏢；就是抓了進去，他們也可以約集同伴去打「徵集處」，死拖活拉地把人搶回來。……』徐州密邇京畿，通都大邑，並非天高皇帝遠的地方。現又正在開着「四省綏靖會議」，這種亂來，「上峯」不至一無所聞。當局口口聲聲要安定，要安定社會秩序，現在這個樣子，眞不知是在「戡亂」還是「添亂」？

苗××　一月廿八日　南京

青島亂抓壯丁

編者先生：本月三四日，青島市區突有武裝軍人，沿途大抓行人，凡青年壯丁，不問青紅皂白，均被裝上大卡車，載赴碼頭。被抓壯丁，約五百餘人，據說載赴烟台，補充士兵。因為眞像難明，以致人心惶惶。憲法第八條規定，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除現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或拘禁。在此行憲開始的時候，青島是治安區，居然隨意逮捕，還談甚麼保障人權？還談甚麼法定程序？青島是十一綏靖區所在地。綏區是膠東軍事總神經，一切軍事行動，皆受其指揮。軍事是整個的，沒有上級命令，不得單獨行動。被抓壯丁家屬，聯合至綏區請願時，綏區表示，「本區未悉抓丁事，既有此事，定嚴行查究」。部隊在肘腋之下，亂抓壯丁，當局猶推諉不知，誰能相信？

郭萍鳴　二月六日　青島

南昌亂抓壯丁

編輯先生：一向尙能寧靜的南昌，今日也在不寧起來。為了「戡亂」，一批一批的小伙子徵了去。現在南昌又在「人力動員」正在高中肄業的學生也要去，政府所謂不受普通兵卒徵召的高中畢業生也要去。到了晚上一兩點鐘，幾個雄糾糾的槍兵會同各保保甲長，挨戶捉拿，拿捉停當，即將該批裝入預備好的汽車，一直開往不知去向。為了這樣，南昌人心惶惶不安。

凌之上　二月三日　南昌

關於工作母機

編者先生：讀貴刊三卷十期史超禮君「美國的機器」一文及三卷十九期陸家澂君「關於美國的機器」一函後，覺得都有些小疑問，就來詢武大董太龢教授的意見，以釋吾疑。當時董先生曾作了些比較的解答，茲錄於後，以供同好者參考。

「Machine Tools」一詞之譯義為『製造機器的工具』，但一切機器均具有『工具』作用，如織布機是織布工作的工具，軋鋼機是軋鋼工作的工具，鍋灶當然是

（下接十八頁）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四卷 第一期

三十七年二月廿八日

本刊傳統

一、祇要無背于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不表示即爲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眞姓名的任何論文。

本期作者

張東蓀：燕京大學教授
周炳琳：北京大學教授
嚴紹端：印度全印廣播公司任職
何永佶：
費孝通：清華大學教授
陳振漢：北京大學教授

政治上的自由主義與文化上的自由主義

張東蓀

近來大家對於自由主義大感興趣，都來作熱烈的討論。我慚愧得很，大公報上有幾篇文章未會拜讀，因爲近來已不訂閱大公報了。雜誌與日報都很有好文章；只可惜現在的人財力有限，實難遍購。所以我所見到的大都是贈閱的。我的見聞雖有限，然而在直覺上似乎自由主義已成目前爭論中問題的焦點了。就我個人論，在拙書中雖再三强調主張自由在文化與政治上之重要，但却從未自居爲自由主義者。因爲在我看來，自由與自由主義在涵義上不是完全相同。其他別種主義者亦並沒有否定自由，甚且亦很强調自由之重要，但却不稱其主義爲自由主義。可見自由與自由主義，這兩個名詞並不完全相同。根據這一點，我現在亦來湊熱鬧一討論自由主義。恕我先把自由主義分爲兩種：即政治的自由主義與文化的自由主義。我並不是主張兩者絕不相關聯，不過在看法上我們確應得有些區別。

我向來爲文章喜歡先把結論列在上頭，然後再加以說明。現在我亦用這個方式。關於政治上的自由主義，我的結論是如下：

政治的自由主義在今天廿世紀已是過去了。

在上文已說過，自由主義與自由並非一件事，則我們當知現在說政治的自由主義已成過去却絲毫不含有否定自由的意思在內。所謂政治的自由主義就是單純的自由主義，亦可以稱之爲舊式的自由主義。這種主張如在中國求其實例，則莫適當於民初的憲政論。民初時代的政治意識大家或許不會完全忘却，似乎不勞我在此短文中詳舉。這種民國初年的憲政主義決不足爲今天戰後立國與建設之方針。梁漱溟先生那篇文章的要點爲我所同意的就在於他能毅然揭穿這個緣故，說明憲政主義式的自由主義不足爲今後立國建國之依據。至於他還有正面文章，說到中國文化的特質，那是他個人的見解，與我完全不相干。我們必須承認他在消極方面說穿民初的憲政主義在今天又復活起來是不行的，這一點確有價值。我爲文表示共鳴亦只注重在這一方面。我把選舉與飛機鐵路視爲同樣的例證。同是西方文化上的好東西，一到中國來便加重了人民的痛苦。我却並沒有主張不要這些東西進來。我只說明其故不在這些東西本身而在於中國有個壓迫人民的統治上特殊勢力。倘這些東西一進來而不爲這樣的特殊勢力所獨佔，則依然是好東西。據有人告訴我有某大學教授看了我那篇文章，立刻作文反駁，說飛機鐵路不可反對。好像在今天的中國知道西方文化之重要的只有該文作者一人；好像用復古的罪名就可輕輕把替人民訴苦的呼聲抵消。立言雖巧，總不免有替特殊勢力維護的痕迹的嫌疑。我起初頗相信自由主義總不致有何流弊；乃近來愈看所謂自由主義者（即自稱自由主義者）的行爲，使我不得不承認這其中確有一點兒問題。

原來自由主義是歐洲十八世紀幾個學者所提倡的一些原理原則。這些原理原則用之於文化，用之於政治，遂形成現在的西方民主國家。這種自由主義之要點在於建立個人價值，成爲個人主義的文化（其詳我另有一文已投中國建設月刊），在個人主義在於養成個人的責任心與自尊心，在原則上絕對與平等無衝突。須知從封建社會把個人解放出來却非用這種個人主義不可。所以十八世紀的自由主義建立個人主義的社會，從歷史上看，乃是一件空前的功勞。其價值眞可謂與日月同光。所不幸的只在於後來由經濟方面發生了漏洞。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盛行時，在經濟方面當然是放任。須知放任政策在資本主義的初期是確有功勞。因爲能够助長生產，使資本主義得以形成。而初期的資本主義又確能增加財富，不會引起人們的反對。不料就因爲這個放任經濟的緣故遂致資本主義長成了，資本主義愈長愈大，其弊乃見。對內愈見貧富不均；對外

愈趨於侵略。政治離不了經濟；經濟或反爲政治的主幹。於是政治的自由主義就爲放任的經濟之故，演至今天，已百孔千瘡了。

全世界的資本主義正在推車撞壁之時，而謂中國猶能如西方在十八世紀時一樣，實行政治的自由主義，豈非太不了解時代麼？所以我說自由主義如專就政治方面（經濟當然包括在內）來講，已是過去了。我嘗說中國是錯過了文化階段。假定在清朝乾隆嘉慶年間實行憲政，提倡這樣單純的自由主義，實在是太好了。事實既不然，則我們便應另有打算。但須知我並不是以爲自由主義不好，乃只是說僅這個還是不够。現在西方人們有些提倡自由的社會主義；有些提倡社會的民主主義，足見單純的自由主義已經不够了。這是全世界的趨勢。

關於政治的自由主義似乎不必多說，請即接着來講文化的自由主義。講完以後，再將二者聯合在一起來討論一下。關於文化的自由主義，我亦願先提出結論如下：

文化的自由主義是人類文化發展上學術思想的生命線。中國今後要吸收西方文化，進一步要對於全世界文化有所貢獻，更不能不特別注重這個自由。

所謂文化上的自由主義却和政治的自由主義很有不同。政治上的自由主義可以形成一個黨，或名爲自由黨，或名爲民主黨。而文化上的自由主義並不須有固定的內容。只是一種「態度」，而不是具體的主張。無論何種學說或思想，只要由嚴格的邏輯推出，有充分的事實爲證據，換言之，是由於科學方法而成，則都可爲文化的自由主義者所承認。現在大學中只講正統派的思想而置其他思想於不顧，這不是文化的自由主義之精神。反之，假定推翻了現行制度，而如果對於正統各種思想加以屛棄，這依然違反了文化自由。所以文化的自由只是一個批評的精神與一個忍容的態度。沒有一個學說與思想不可以批評。牛頓的定律在五十年前是金科玉律；倘若阻止人們對之有所懷疑，則相對論便無由發明了。今天相對論修改牛頓，正是文化自由的燦爛成果。同時，亦沒有一個學說或思想不可以忍容。只要言之成理都應得加以承認。總之，在文化自由上根本不能有「邪說」，亦不能有「一尊」。只有研究的所得而無開始的信仰。無一前提不可轉爲研究的對象。這樣的精神確是西方文化在人類上的唯一優點。中國在未與西方文化接觸以前就沒有這個優點。現在既與西方文化接觸了，雖然有些傳染，但終嫌尚未十分接受。今後中國如果要想在文化上立足則非大大向這一方面推進不可。

於是我們應得合併在一起討論了。現在的論壇上總是爭論甚麼政治自由與經濟平等之關係；有的說二者有衝突；有的說二者本相一致。在我看來，都沒有輾辟近裏。他們只用自由與平等二個範疇。殊不知還有第三個範疇，是「生產」，却必須加入在內。無論如何講自由，講平等，若與生產發生衝突，換言之，即使生產反而降低，則決不能成功。而況在現在正值大戰以後，各國都有迅速增加生產之要求。這是一個普遍的趨勢。中國決不能例外。所以在自由與平等的打算中必須把生產列爲最重要的一個決定因素。這不僅現在爲然；歷史亦給我們以教訓。歐洲近百餘年以來社會主義的試驗不止一次，或用革命的方法，或用立法的方式，凡讀歷史者當可知之。我們可以說百餘年來歐洲社會主義的排演是一部悲慘的歷史。這個悲慘經驗所給人們的教訓是：凡社會改革（或革命）而能使生產增長的就能站得住；反之，使生產降低則必會被反革命所推翻。蘇聯的經過尤爲顯明：革命之初的戰時共產制就因爲不能滿足增產的要求以致維持不下去了，乃不得不改爲新經濟政策。如新經濟政策永久下去，則革命雖成而社會主義却失敗了。幸而有計畫經濟。可見計畫經濟是社會主義的救命湯。換言之，即社會主義與計畫經濟相結合乃得到新的生路。須知計畫經濟是一個中性的名詞。資本主義亦可有計畫經濟。法西斯亦有計畫經濟。可見不是所有的計畫經濟都是進步的。對於經濟加以計畫要看用甚麼原則去計畫。資本主義的後期亦在那裏講計畫，但却依然用着資本主義的原則。所以必須用社會主義爲原則以作計畫方能成爲進步的計畫經濟。用計畫經濟以增加生產遂使社會主義站得住，這乃是蘇聯對於人類的一個無上之貢獻。蘇聯的成功即在於使增產爲目的的計畫經濟與社會主義結合。已往社會主義種種試驗都沒有成功，就是因爲只注重於平等而忘了生產的重要。

中國今後必須採用計畫經濟，恐怕已爲大家所公認。因爲只有這樣方能大量增產。但爲了增產必須先排除其障礙。官僚資本，豪門資本，是障礙之一。地主與放高利貸的是障礙之一。所以廢除這些，不完全是從平等着眼。如果專從平等來看而忘了增產上的需要，這是錯誤的。尤其是在產業落後的國家，不把這些封建殘餘勢力去掉是無法使產業發達的。（不過中國還有一個特別情形：即除上述兩種人以外尚有一種人，即流氓是也。普通所謂無產者是指無財產而從事於生產之人，如佃農與雇工之類。中國的流氓確是無產者，但却不從事於生產，以敲詐爲生。這種人只要求在享用上得平等。其實正是封建社會的產物。所以如果不把這種人加以改變，其爲增產之障礙亦與上述者相同。因爲本文不在討論這些問題，故只在括弧中附帶言之。）至於如何製定計畫務使在其中保存儘量的自由與相當的平等，那是製定者的事，非本文所能詳論。

說到此，我們便見到問題的中心了。爲了生產既須用計畫經濟，須知在經濟方面要有計畫，則勢必連帶到其他方面，如政治方面，教育方面等等。所以，就因爲經濟的計畫性必須把全社會成爲有計畫性的。我們爲便利起見，可稱之爲計畫的社會。在這樣的計畫社會中，試問自由有無限制，平等是否損害？我以爲論者們主張經濟平等必使政治自由有虧，固然是只知二五不知一十之言，但說經濟平等了以後自由更可增加，亦非探本之論。老實說，一談計畫，如果社會有計畫性，則只能有計畫以內的自由與計畫以內的平等，而斷不容有超計畫的自由與超計畫的平等。計畫是以增加生產，使全體人民生活水準提高爲目的的，則凡自由之足以妨害生產的提高，凡平等之足以使生產降低，則都應該在限制之列。論者以爲自由平等本身有問題是錯誤的；須知問題只在產業不發達的民族必須把生產加入於自由平等之中。一班刊物上有流行的說法，說

甚麼英美有政治的民主而無經濟的民主，蘇聯有經濟的民主而無政治的民主，都由於不明白這個情形。還有人說中國應該二者都要。其實這只是一句漂亮話，根本沒有用過一番分析工夫。

根據上述的話，應知自由在今後的中國確有問題。平等更然。我希望自命為自由主義者的人們不要看得太簡單。我對於這個問題却有一個答案。我嘗說，就人類言，最理想的是一個民族經過充分個人主義的陶養以後，再走上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之路。可惜世界上沒有那麼一回事。我又嘗說，中國沒有經過個人主義文化的陶養而遽然來到二十世紀是一個遺憾。現在不必說這些空話。就實際來說，中國已經到了這步田地，當然無法追究既往，亦沒有法子倒退。不過亦未必是絲毫無辦法。現在用一個不十分切合的比喻。譬如入大學最好是中學畢業。無如有一個人，中學未畢業，而現在竟在大學中勉強讀書了。我以為最好的辦法是他把大學的功課少選一些，留下一點兒時間來補習中學的必修科目。我用此比喻來說明中國今後的情勢。中國為了增產必須採用計畫經濟，尤其必須採取進步的計畫經濟，但經濟方面一有計畫勢必不能讓其他方面仍留為無政府狀態的絕對自由。就中以教育一項而論，就不能不大加改變以與計畫相配合。政治經濟教育等全體如有了計畫性，則我們今天放任慣了的人必會感到很不便。這一點恐怕我們在心理上應得準備自願犧牲一些不入格的自由方好。這即是我用大學功課來作比喻的。至於補習中學一層，即是我所說的文化上絕對自由。須知在計畫社會中政治經濟等是沒有絕對自由了，但我們還不能不要絕對的自由。這個絕對的自由應該在文化與思想方面。如果社會因具有計畫性而有些呆板，則我們尚留一個絕對活潑的田地在其旁邊。老實說，社會的計畫性只是為了生產，總是有時間性的；一個計畫完成以後必須增改。所以社會的一時固定乃是一種不得已的事，亦並無絕對的可怕。但却必須在固定中留有一個變化的活力可以發生的餘地。這就是文化方面的絕對自由。我主張在這一方面使中國養成良好的自由傳統，充分培養個人主義的良好方面。此即我所謂補習中學功課是也。本來在西方亦是自由主義的根底本在於文化。文化上沒有自由主義，在政治上決無法建立自由主義。中國今後在文化上依然要抱着這個自由精神的大統。文化上的自由存在一天，即是種子未斷，將來總可發芽。所以使這二者（即計畫的社會與文化的自由）相配合，便不患將來沒有更進步的制度出現。

話幾乎說完了，不妨再向所謂自由主義者進一言。大家如認定上述的分析是對的，便應力爭計畫內的自由與平等，但不可仍留戀於未入計畫以前的自由平等。如實在眞愛絕對的自由，則應向文化方面努力。我說這些話，主旨在把這個問題中的幾個關鍵弄清楚。其實這些話並不是現在想起來的，乃是久已想到的，至於說出來以後，任何一方面認為是不入耳之言，那我就不管了。

二月四日

本文寫完以後，忽覺我在前文〔關於中國出路的看法〕（觀察三卷二十三期）有容易引起誤會的會方，不得已在本文之末追加聲明幾句：即我所謂東歐式幾個民主國家並不是嚴格言之，照類型來說，其實瑞典至少應該在內。所以嚴格分為東與西，是不對的。瑞典最近發表戰後勞動計劃宣言，尤其富有所謂這樣的澈底民主之精神。總之，這些小國頗能利用別國已往的成功或失敗的教訓。中國有其特殊的國情自不待言，但對於利用他國的教訓與經驗一點，却不妨以這些小國為師。這便是我的眞意所在。千望樊先生與讀者不可誤會。

雖然對立，不見得就有戰爭

周炳琳

近來在中國，「兩個世界」之說頗為流行。這話本是從「美蘇對立」說起的，不經意的便說成「世界成了兩個」。作這種議論底人心目中橫着一個戰爭底暗影，大概不久便要進一步發出「第三次世界戰爭底到來只是時間問題」底議論了。這種說法有很壞的影響，至少助長一個不長進的心理，那就是：「沒辦法。世界都成了兩個，人類底互相殘殺如何能免？我們中國現方進行着底內戰來頭大的很哩！有些人還在希望重見和平，唉，勸他們還是收拾起好夢！」可能並助長一個比這更為醜惡的心理，那就是：「世界局勢這樣分曉出來，好極了。我們的內戰本就是『戡亂』；在對立的世界中，我們的是前哨戰。美援必會源源來的。打下去，打下去，能打下去便有辦法。」這後一種心理是希望禍亂得更大，我們好從中沾便宜。但是，朋友，且慢高興。世界和平底放棄與戰爭底發動，眞如你所想的那樣容易嗎？

如果想找發動或挑動戰爭底機會，在去年一年，尤其是莫斯科外長會議以後底國際政治裏，那眞可以說是多至不可勝數。有過戰略上重要地點底攫取，有過干涉鄰國內政底事情，並在互致恐嚇與不敬，訴諸情感與偏見。這一類事，可以說，任何一樁都是引火的東西。有人說過，兩邊都在堆柴，愈堆愈高，高到過頂，以致彼此不能面對面相看。這話一點也不錯。但是依舊沒有人願擦上一根火柴。這證明了什麼？這證明了蘇聯不要戰爭，美國政府不要戰爭，雙方都不要戰爭。

這不是說美蘇以外，在歐洲，在其它地方，沒有人在談論戰爭，或害怕戰爭。談論或害怕的，正大有人在。這是一種心情，它的發生有一大部份是屬於

世人底失望：失望大國看法一致竟成了幻想，強權政治一直未離開世界。另一部分則由於一種希望：希望在混亂中討便宜，譬如歐洲有一些反動的站不住脚的政權或分子，便在那裏希望美國留駐歐洲，俾使他們的壽命得以延長。恐懼心所佔底成份怕也相當高：恐懼一個擁有這樣一個強大的武器如原子彈底國家，由於它的年輕與缺乏經驗，忽然不能自制，想走捷徑以求統馭世界。宣傳也是一個原因，它把羣衆底吶喊傳到政治家底耳裏，使他們有時忘記了苦心折衝是他們的正務。而蘇聯在外交上所採用底方法也是一個因素，那便是他們的頑梗，與愛專講一面倒的現實。

情勢眞够得上說是緊張，但何以竟沒有緊張到危險的地步？何以從一九四六年八月狄托元帥擊落一架美國飛機之後沒有發生過一樁像是踏入危險境界底事？到快要「交綏」了，何以忽然又持重起來？要爲這個問題找回答，我們應該先了解：在今天，戰爭，尤其是強國間大規模的戰爭，因何而會發動？在從前，連一九一四年在內，戰爭憑偶然發生的事故就會發生。或由於誰在槍靶上失了手，或由於誰的不小心在一個火藥庫裏吸烟。但今日已不復如此。聯合國的存在，以及歷史昭示的戰爭所藏有的可怕的危險，必足以防止任何純因偶然事故而發生的戰爭。戰爭的爆發，其惟一可能，將是因爲有某強國須要戰爭。而一個強國須要從事戰爭，在下列兩個理由之中，必居其一：或則有如希特勒之在一九三九年，因爲它不但相信它可由戰爭達到它的目的，并且相信可以很容易的很快的以戰爭來達到它的目的；或則因爲它見到人家在作戰爭底準備，懼怕得厲害，竟促使它在時間還來得及時即先下手。

我們說現在沒有戰爭底危險，是因爲現在沒有一個強國對於戰爭底結果有够強的自信力，也沒有一個強國懼怕和平底後果懼怕到够強的程度。這不是說美國和俄國不是在那裏追逐彼此相反的目的，這是說它們尚在依非戰爭的手段去追逐它們的目的，并且至少在短期內將繼續循非戰爭的路去追逐它們的目的。兩年以來（這拿正常外交的尺度去量，是一段很短的時間），美蘇兩國都希望在德日失敗以後留下來底地盤中分劃他們的勢力範圍。這個追逐正進行到了去年十二月倫敦外長會議正破裂，算是達到了頂點。在倫敦外長會議上，關於德國問題要想達到協議，希望原就不大，但那次的破裂，祇能說又一次證明美蘇的不易協調，不見得因那次的破裂便使美蘇之間的情勢更加嚴重。

在美國，有喧嚷不休的所謂「戰爭販子」，在蘇聯，更有神經高度緊張的盛氣凌人的人物，各在捉摸戲弄對方的恐懼和野心。這誠然就是所謂「冷戰」。但並無迹象顯示站在這些人後面底政府（實際決策在兩國都只有少數人）在要戰爭。明顯的，它們都寧願採用「其它的方法」，如金錢與物資的使用，以及在思想上拉攏伴找和幫等等。這些「其它的方法」，彼此之間已正式開始鬥爭了。柴道夫對各國共產黨的指令和馬歇爾援助西歐民主國家的計畫，已在針鋒相對開始作正面的衝突。這一衝突必將經歷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各作各的算計，藉以校量對方，捉弄對方。有不少人特別對蘇聯存備戒心；但現在並無證據足以說明蘇聯的統治者有心拿武力戰爭去支持其鬥爭，效孤注之一擲。他們對於美國底軍事力量不至於一無所睹，但也不至於懼怕到足以促使他們去冒戰爭底危險。他們知道如果他們發動戰爭，結果可能是勝，亦可能是敗。勝敗機會的相等，也許可以不太計較，所慮的是這一戰爭必將是一個長久的艱鉅的戰爭；那正是他們所不敢從事者。因此，俄國底政策，在策略上雖然是進攻的，在目的和口調上卻是防禦的。在兩個主要的角逐場裏，即法國和義大利，很明顯的，法義兩國的共產黨現在所採取底新策略，恰恰反映着它們是接受它們尚不能當權這一事實的。至於美國，若有人以爲它循它現行的政策去行事，不待有意外激變即會引起宣戰，那只是暴露他對美國認識不足——雖然美國近來的「軍國」趨勢，確易使人發生上述這種膚淺的看法。

以上只是說明美蘇之間目今尚無戰爭底危險。但推遠一點看，又如何？悲觀論者，即持「兩個世界」之說者，可折回來辯說道：戰爭在兩個企求稱霸世界者之間總是不可避免的。這有兩點理由。第一，俄國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和美國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不能並存；第二，蘇聯的向外擴展必將和美英的利益，無論在歐洲、在中東、乃至在遠東，發生直接衝突。不錯，對於長期和平過分樂觀，不免招致愚蠢之譏。而且人類一向便未做到過維持和平到相當長的歲月。現有的證據也沒有能告訴我們今日這一代智慧比從前高過多少，環境比從前好過多少，必能將前人之失敗變爲成功。但我們至少可以這樣說：從來沒有一次戰爭眞是不可避免的，今天所談論底這一個尤其缺少不可避免的根據。在歐洲或在世界任何一處，並無不折不扣的美國主義和不折不扣的共產主義同時在生長。兩者之間會有不少稀奇的各種各樣的妥協將它們分隔開來。西方物質上的重配備和技術上的加進步多半要比東方爲快，因此物質上的吸引力與優越仍將屬諸西方。

儘管劇烈的利害衝突，思想的、經濟的、政治的、乃至領土的，必將繼續存在，我以爲武力戰爭，就是推遠一點看，也不會爆發，除非俄國的統治者（因爲美國先取攻勢的可能性似乎很小）硬要發動戰爭；那是說，要等到他們或以爲很快的便能取勝，或竟懼怕傷了，懼怕到接近於他們的宣傳人員所誇張底程度。英美，尤其是美國，如有高明的政治家，他們應當知道對付莫斯科最好的辦法是叫它不要過分自信，以至引起僥倖一逞之心，也不要讓它過分害怕，以至於挺而走險；後者尤其重要。高明的政治家應該不放棄任何機會向世人宣告，並以事實表現：他們最終的目的是要和蘇聯得到協議，彼此共存，而絕無毀滅蘇聯之意。

前一晌，美國的不讓步態度，處處表示其決心之強，似乎有點渲染得過分。愛護世界和平的人躭心深居在克林姆宮底俄國人抱着他們原有的一套思想，再加上他們對於他國之不求了解，心懷疑慮，會發生眞正的懼怕心，以爲美國在政策上表現那樣躊躇滿志，蘇聯已受到壓制了。近日美國內部情形漸趨複雜，各方對馬歇爾計畫的烘托似乎也在降低其程度。這正是頭腦冷靜一點底時

候，緊張的局勢可望和緩下來。兵家用兵切忌窮追，在外交上也忌窮追，尤其遇到這個被追的是一位俄國人。英美政治家似乎尚喻此旨；我看武力戰爭，就是推遠一點，也是不會爆發的。

世界如有災難，我們決無便宜可沾。反之，可能要遭「滅頂」之禍。願好談「兩個世界」者亦反省反省我們自己的已成了什麼「世界」！

歐洲與美援

——馬歇爾計劃的眞面目

Victor Perlo
David Ramsey

本文刊於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二日出版之新共和雜誌(The New Republic)。作者 Victor Perlo 及 David Ramsey 均係美國著名經濟專家；前者歷任政府機關如美國國庫署戰時生產局、物價管制局、商務部等的經濟顧問。

王作民譯于哥倫比亞

去年九月，歐洲十六個國家，響應馬歇爾國務卿的建議，草擬了一個歐洲合作復興計劃，交給美國。擬定計劃者是歐洲十六國合組成的歐洲經濟合作委員會(Committee of European Economic Coorperation，以下簡稱歐洲經委會)。這計劃要求美國除了繼續緊急救濟以外，更輸送大量的原料及工業設備到歐洲去。歐洲經委會的目標，簡單地說，是想使西歐的生產激增，生活水準恢復到與戰前差不多，國際貿易能達到平衡。草案的主要點，可列舉如下：

擴展工業，穩健地發展國際貿易

全歐洲經濟合作

德國的復興應與全歐的復興相適應

執行本計劃者乃歐洲自己，美國可從旁建議。

三個月後，杜魯門總統以美國官方的馬歇爾計劃草案送交國會，這計劃，正式的名字是「歐洲復興計劃」，現在正在國會裏討論，尚未通過。仔細研究這官版的計劃之後，發現它與歐洲經委會所提出的，本質上已經不同。它的主旨是如何擴大美國的勢力範圍，並非如何幫助歐洲共同努力自給自足。它的要點也可列如下：

並不針對如何發展工業，穩定貿易諸問題

並不鼓勵歐洲經濟復興

德國的經濟利益爲首，西歐其他國家的反而爲次

使西歐內部經濟機構在在受美國控制

（一）

英法及西歐大多數國家眼前的經濟問題，倒不是修復戰爭中損壞的工廠問題；因爲這些工廠，縱有損傷，根基仍在。在有些國家，基本工業或者仍與戰前一樣，或是早已更加擴大。歐洲眼前眞正的問題，是一個如何解決生活的問題，這是幾十年來歐洲首次遭到的難題。戰前英、法、荷、比等國所以生活水準有那麼高，海外投資有絕大關係。可是現在這項來源大部已斷絕了。縱使荷蘭人在印度尼西亞，法國人在安南，英國人在中東仍在作種種努力，但想恢復戰前情形，是不可能的事。

因此西歐諸國，如要穩定經濟，提高生活水準，必須另尋出路。出路呢？是怎樣提高工業效率，提高生產量，同時能將產品到世界各市場推銷。歐洲經委會的報告，是很注意以上各點的。因此該會提出請求美國供給西歐大量的鋼及工業設備，理想的目標就是要提高生產，使電量供給超出戰前三分之二，鋼百分之二十，鍊油百分之一百五十。

官方馬歇爾計劃，口頭上是承認這些要點的。尤以杜魯門總統的演講，圓轉週到。可是研究一下推行時的細節，就可以了解，歐洲這種復興的目標，早已大大被改頭換面了。從總統給國會的報告，各種官方及非官方的報告與文件上，我們知道美國着重的問題是運送煤和糧食到歐洲去，並不是怎樣去發展一個豐裕自主的歐洲經濟。

參議員塔孚特一向反對任何發展歐洲工業的大規模援助。杜威州長更暗示說，假如歐洲需要工業，那麼美國就該鼓勵廠家到歐洲去設分廠。至於整個國會的態度，最近召開的特別國會，屢次發表的文告就很可代表。國會竭力主張援助的範圍，應嚴格限於必需品。塔孚特及若干和他意見相似的國會領袖，恐怕要以一切手段，使馬歇爾計劃中的一點兒「復興」部份，都不能立足——政府當局呢，在這問題上大約要爭一下。

從馬歇爾計劃中的詳細綱領上，美國的態度便可了然。給國會的報告上對西歐各國的原來的草案，大加批評，說：「關於解決住屋，擴充工業，公用事業及一般的復興事業方面，這草案都太誇大。」國務院聲稱：「因爲歐洲高度的資本集中，使人民更形節約，因而出口貿易難以發達，這也是目前通貨膨脹的一個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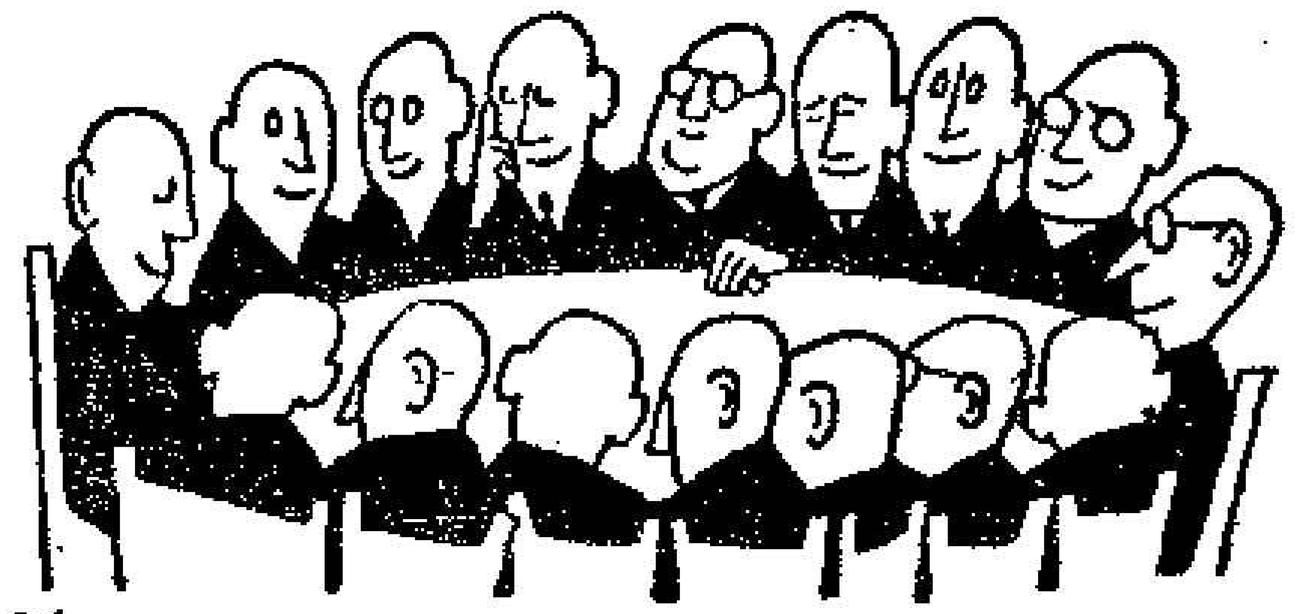
但是自從戰後，資本的集中尚未達到足以修復戰時破壞的程度。更談不到工業的擴充。至於出口困難，通貨膨脹等現象，與其說是因爲投資過多，還不如說他是因爲若干基本原料的不足。

爲了自身的復興，西歐各國能夠，而且也必得，集中一些資金，數目至少得相當於歐洲經委會所草擬的生產計劃中的全部生產之百分之二十。這樣一個目標，絲毫也不誇大，只要以最起碼的國內經濟控制就可達成。

戰爭期間，限制更嚴格的時期，大多數參戰國的投資，達到生產量的百分之四十。蘇聯曾經在比現在的西歐更艱難的情況下，完成她的建國計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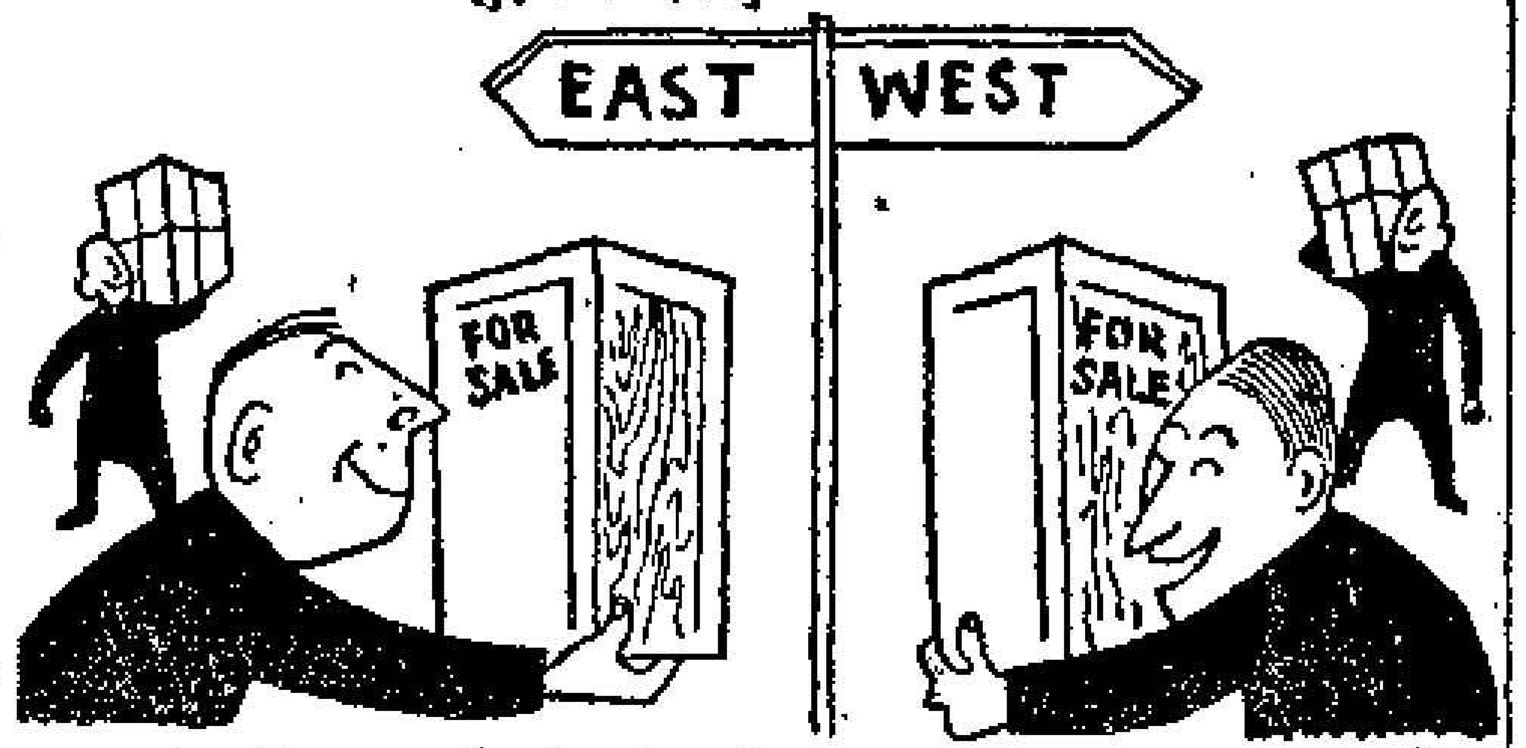
杜魯門總統將這削減西歐投資的理論應用到他的物資供應程序裏去了，使歐洲經委會原來的草案失去了鵠的。原草案中申請的粗鋼，美國祇答應給三分之一，所要求的鑄鐵，全未提起。至於鋼鐵工廠及製造農業工具等設備，原來的請求至少被打了對折。原草案要求美國進口貨中百分之三十二關於再生產物資及生產鋼的原料和機器，但杜魯門總統提交國會討論的馬歇爾計劃裏，這項已減到百分之十四，而且這百分之十四裏同時包括國際銀行的輸出。要知道，國際銀行是另一回事，原來並不是歐洲復興計

馬歇爾計劃有两個



第一個：十六個歐洲國家組成的歐洲經濟復興委員会草擬的方案

歐洲經委会要求歐洲能依仗自己的工業而獨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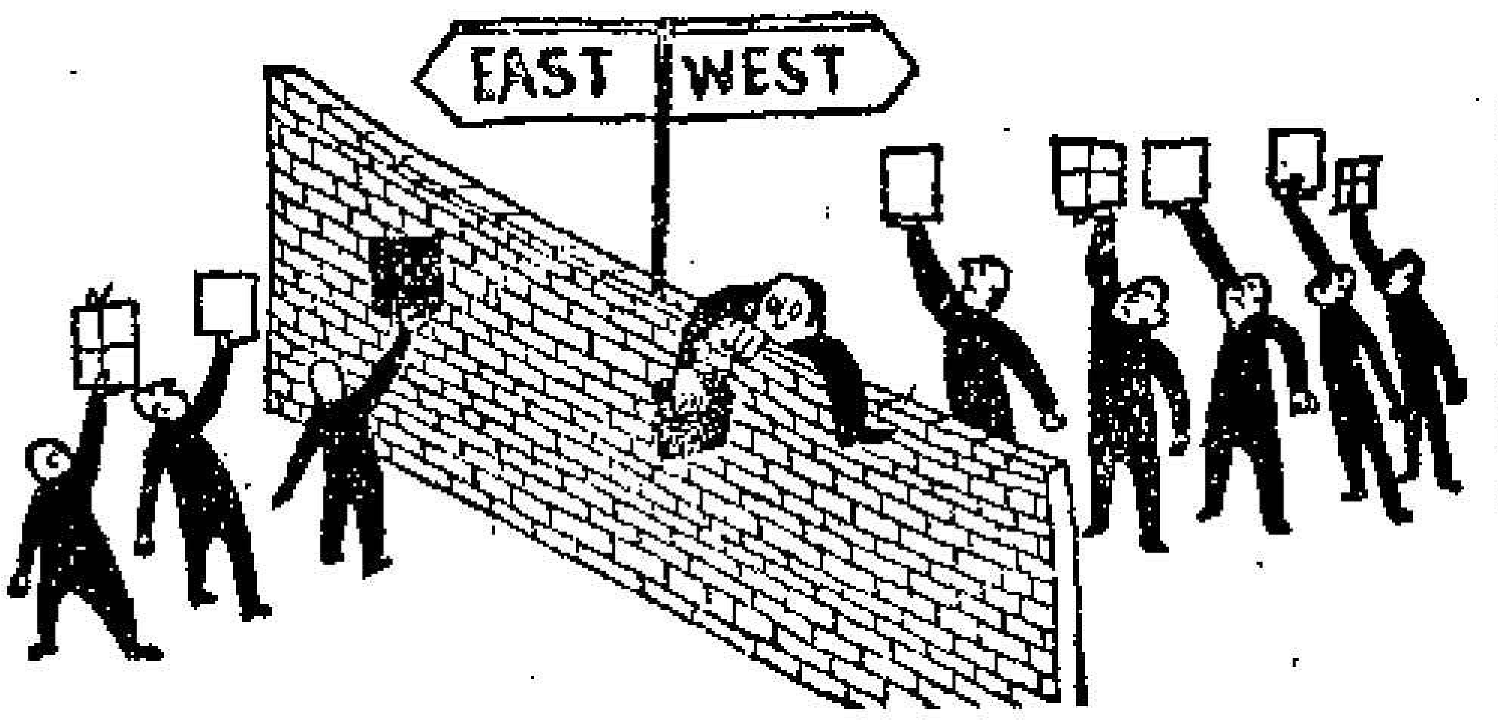
歐洲經委会要求歐洲各國互相通商

歐洲經委會要求各國共同努力從事復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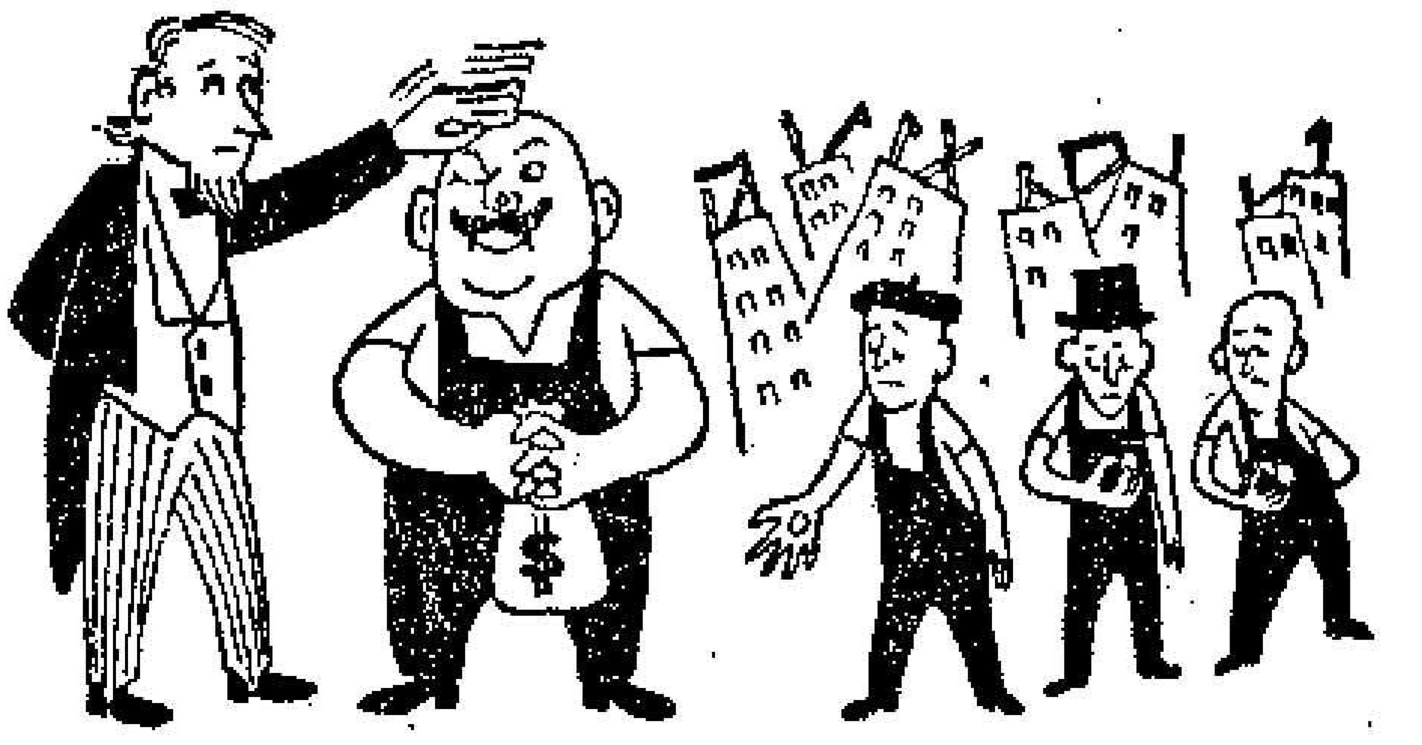
歐洲各國要求参与國合作解決經濟方案

第二個：杜魯門總統送交國会的美國官方馬歇尔計劃

美國要他們不斷地哀求施捨



美國的反共政策阻挡了彼此的貿易



美國要先把德國喂肥

美國要操縱一切

由鋼的輸出問題上，可以看出美國是如何不願幫助歐洲恢復對外貿易。歐洲經委會力請美國供給粗鋼及廢鐵，那樣，歐洲每年就能出口三百萬噸的熟鋼（所請粗鋼及廢鐵僅及美國在戰前該項輸出之一半）。假使美國答應這個請求，西歐就可從鋼的出口中每年收進五萬萬美元，同時還可以收回與鋼有關的貨物的市場。

但是杜魯門批駁了這請求，減低生產鋼的原料與物資的供應，說是因爲美國自己也缺貨。實際上，歐洲經委會所要求的不到美國全部鋼的生產的百分之五。如果美國國內能有一個公允的配給制度，提出百分之五，並不發生嚴重影響。政府的自相矛盾更可從熟鋼的供應上看出來。政府要給歐洲的熟鋼，比歐洲經委會原來的請求多三倍！這辦法是完全符合美國鋼鐵企業公司的利益的。戰前英、德、比的鋼鐵市場，現在全被美國接收了。不但如此，他正利市三倍，財源興旺，向國外買主要價比國內價格高出二倍甚至三倍！

馬歇爾計劃的精神，從頭到尾，是減少對歐洲再生產原料的供應，削減歐洲的市場，以符合美國大企業的利益與方便。美國老百姓方面是要犧牲一點的：消費要減少，物價要增高，可是企業家却不損毫釐，不丟掉任何一個國際市場，也不失去任何一個投資的機會。

更厲害的是，馬歇爾計劃還沒通過，英法已被逼縮小他們的投資計劃了，尤其是住屋建築的投資。因爲要按照預定，提高生活水準。如果西歐各國接受了美國政府的馬歇爾計劃，那麼原來歐洲經委會的計劃就無從實現，談不到發展工業，現代化諸問題。歐洲各國將更依賴救濟以生存，如糧食及燃料的施捨。提高生活水準這件事將一拖再拖，明擺在馬歇爾計劃裏的事實是，西歐在一九五二年，生活水準還得比戰前低。換句話說，就是歐洲人民心裏明白，身經六年慘戰，三年救濟生活，再加上目睹歐洲復興計劃施行四年之後，自己的日子，還是抵不過一九三八年時那麼舒服。

（二）

馬歇爾計劃，除了復興歐洲之外，另一要義，是歐洲的合作。但是如果問題的焦點不集中到東歐與西歐的貿易上去，討論合作是句空話。照現在，最多，歐洲只能像戰前那樣和拉丁美洲、非洲、亞洲通商。如果想增加輸出，支付一個像樣的生活水準，戰後西歐的市場，必得以東歐爲主。同時還得依仗東歐的原料供給。

歐洲經委會很看重東西歐貿易這問題，這幾乎是原草案的主幹，雖然爲了不言而喻的原因，實際執行的步驟並未規定下來。這在馬歇爾作哈佛演講之前，向這方向進行的努力早就開始了。同時聯合國的歐洲經濟合作委員會及其他方面，也在加以研究。譬如最近聯合國的報告裏提出：如果美國可以將價值五百萬美金的特種製木機器供應東歐，東歐就能輸出木材到西歐，使西歐由進口美國木材項目下，節省每年七千萬美金！

杜魯門當然知道歐洲的願望，在他的演說中，他提到政府的計劃是「根據以下的信心，即在以後五年時間內，使東西歐的貿易能恢復戰前的正常狀態。」可是爲了美國與東歐的不能合作，這目的的實現就受到阻礙。不合作是美國的現行外交政策，連馬歇爾計劃本身也不過是這政策的一環而已。

再舉個例，歐洲經委會原來草案中有個假定，假定能買波蘭的煤，就可不必進口美國的昂貴的煤了。最近聯合國的研究報告也說到，如果美國（只有美國有這能力）供給波蘭價值九千萬美金的採鑛與運輸機器，材料，那麼波蘭的煤的產量就可提高到比現在法國的消費量多三倍，比魯爾的消費量多兩倍，這樣，西歐各國可少向美國買煤，每年可省五萬萬美金！

可是這種貸款的希望是小極了。馬歇爾表示計劃之先，東歐的貸款請求已不知若干次被擱不理。即理睬一下，也不知折扣到如何程度。近幾個月來，商務部部長哈理曼、及其他政府發言人說得更明白了，美國政府是不貸款給「集權政府」的。波蘭還在指望世界銀行的貸款，藉以提高煤的輸出，不過世界銀行裏的美籍高級官員，未見得會違背了本國的外交政策，批准這種貸款。

杜魯門提到恢復東西歐「正常貿易」，可說是針對現在歐美的批評而出的。各處對馬歇爾計劃阻礙了歐洲內部的通商，已嘖有煩言。但是東歐呢，對這種「正常」的恢復必定要反對的。戰前，東西歐的經濟關係是：西歐控制東歐的經濟，東歐將原料出口到西歐，可是同時西歐不將工業化的物資供給東歐。

無疑地，波蘭及巴爾幹各國會反對接受這樣的「正常貿易」。會堅持要擴充本身的工業，提高本國的生活水準。眞正的歐洲合作，其主要精神，應同時以東歐西歐的利益爲重，使雙方站在平等地位通商貿易。

（三）

一切恢復德國經濟支配地位的努力，特別像希特勒時代那樣的支配權，必遭受東歐的強有力的抵制。西歐別的國家所担心的問題，就是如果德國得到優先機會，從事復興，那麼這次受支配的恐怕不是東歐，而是他們自己了。

這種憂慮，由歐洲經委會的報告裏在在反映出來。因此草案提出德國的復興應與西歐其他國家的復興相適應。草案並促使將魯爾區的煤運到法國及其他國家，以便發展法國等地的鋼鐵工業。歐洲經委會語氣沉重地說：德國的經濟發展，「如果危害了歐洲別的國家，像過去那樣」，就有加以阻止的必要。它還說：「德國有義務……賠償戰時損失，並協助犧牲在她的侵略下的國家，從事復興」。

美國要讓德國首先復興這件事，雖經官方一再否認，——最近，杜魯門也否認過——可是仍不免由國會及政府的文告，以及最近提出的對德協助案裏顯露出眞面目來。主張「德國第一」的如前總統胡佛，美國機械大企業約翰曼維公司（Johns-Manville Corp.）的老闆路易勃朗（Lewis H. Brown），他們的理論正是現在政府所忠實遵循的。去年十二月九號陸軍部部長勞易爾對參議院撥款委員會說：「我們不但要使西德經濟自給，還要使她工業潛在生產力能成爲歐洲復興的奠基石。」

爲馬歇爾計劃辯護的人，都認爲西歐的繁榮是建立在德國的經濟上的。但是事實上並不如此。過去德國激烈的競爭，使英法在世界市場上失色。而德國與西歐諸國的通商呢，一九三八年，對德國的輸出只佔英國全部出口百分之四，佔法國全部出口百分之六。西歐的小國與德國通商數量較大，但是大多數仍舊不免同時在國際市場上與德國競爭。

歐洲經委會草案中，說明要以美國援助中百分之十五予德國，比德國分得多的國家，只有英法兩國。即使這樣，哈理曼委員會（譯著：總統的經濟研究委員會）仍不滿意，批評說：「德國應該接受比巴黎決定的更多的救濟」。最近美國佔領區軍政府一個官員在他的報告上提到馬歇爾計劃，估計西德可獲四十四萬萬美金以上的救濟。那樣要佔杜魯門給國會討論的計劃的全部費用之百分之二十七。德國更可以得到不少間接援助，如軍費的支出，剩餘物資等等。救濟目標已由西歐其他國家轉到西部德國，近來更看出對其援助有銳減的象徵，很可能將來德國所得要比其他一切國家爲多。

西歐國家除了救濟物資少得以外，還要犧牲德國的賠償。這些國家，原指望可獲取一筆賠償，從事復興建設的。可是直到現在，所得尙是微不足道。馬歇爾在倫敦

外長會議上根本否定了賠償計劃，對於這些原想從西部德國取得賠償百分之七十五的國家，眞是當頭一棒。原來想以德國原料爲賠償的辦法，迄今仍是一紙空文。現下國會壓力漸漸增高，想根本取消這種打算。從馬歇爾在倫敦的立場來看，這是一個自然而又合理的結果。

華盛頓的舉動，好像要西歐諸國反過來賠償德國了。歐洲經委會草案上要求美國供給運貨卡車十萬三千輛，若干國家，車子被納粹刼持，迄今尙留在英美佔領區內。這些國家應分得九萬輛美國救濟的車子。可是馬歇爾計劃，通過駐德軍政府，要求西歐諸國如要求歸還納粹刼持的車輛，便須以自己奪得的德國車輛來交換。歐洲經委會所請求的數目已被減低到二萬六千輛了，這些又完全指定給西部德國！

西部德國主要的貢獻，以歐洲而論，應當是把魯爾的煤輸出到法、意、荷，讓這三國的鋼鐵及其他工業增長起來。戰前德國每年約出口煤二千五百萬噸，目前的魯爾出口量，以年算，約合一千萬噸一年。英美軍政府表示到一九五二年，大約可希望增加出口到二千四百三十萬噸。不過報上却盛傳在德國黑市場上買賣的煤有二千萬噸，如報上的報導沒有錯，那麼現在德國就可以每年輸出三千萬噸

軍政府計劃使德國煤的生產，全部恢復。但鋼的生產只恢復到戰前的百分之五十。照路易勃朗替軍政府作的報告說法，也許到十年之後，才能達到這鋼的生產目標。他的估計要是對的話，那麼魯爾每年剩餘的煤該達五千萬噸，比英美軍政府眼前想到的目標要高兩倍。

可是，照勃朗的說法，全部德國的煤都不出口，以便把德國重建成「歐洲一個偉大的洗心換面的國家」。眼看這種「德國第一」的政策更逐漸露骨了。美國現在已答應負担佔領區的全部開支，交換的條件，是對經濟問題有更大的權力。像這樣，美國就「買」到了對德經濟委員會的操縱權，將進一步支配整個西德的經濟機構。種種事實，證明美國政策的動向，縱然當局再三否認馬歇爾計劃主要的目標是重建西德，將德國戰前在歐洲的經濟支配地位恢復光大。而鐵一般的事實，却是這否認的最有力的反駁。

（四）

照原來馬歇爾的說法，這計劃本來百分之百是歐洲的事，美國不過以同情的態度，從旁加以協助，連計劃的起草，都絕對避免干預的。當時，若干人士，還相信也許美國政策有了變更，因爲這種現象不同於杜魯門主義，更不同於貸款與英、法、義時所附帶的種種嚴酷的條款。

可是仁慈的表示很快就接觸到政策的現實。美國的衆議員們公開干預了十六國參與的巴黎會議，以至使歐洲經委會非徹底重寫報告不可。原先想要求二百九十億美金（$29 billion），後來縮到二百二十億（$22 billion），更添上一個全套的「附帶條件」，這些條件根本牽連到參與國的國內經濟機構。

還不止此，跟着大企業公司也提出建議來了，隨着國會議員又到歐洲去遊歷起來了，政府裏各式委員會也提出意見來了。種種嚴厲的條款，包含在臨時緊急貸款裏的頗多，可是附在官方馬歇爾計劃裏的更多。像這樣厲害的外來的經濟干預，除了在戰勝國佔領戰敗國時見到過以外，歐洲可以說是前所未見，前所未聞。國會裏提出的經濟合作案中幾個主要的管制可分析如下：

歐洲復興計劃的執行者，不是十六個參與國組織的團體。每個參與國與美國單獨締約，由美國設一執行人，締約國的每一項出口，每一項計劃，均由此人批准，因此美國就控制了大部份歐洲對外的貿易。

計劃中主要部份，如糧食、燃料、肥料等輸出，應算作美國的贈與。接受這贈與的國家，必須以相等於該物資的本國貨幣存入銀行。這筆錢該國可以動用，但須經美國同意。如此每一參與國必有大量貨幣，其處置權操在美國。華盛頓由此可影響每一參與國內部經濟機構。

每一參與國，爲取得美國援助，在決定穩定通貨、匯率、關稅，控制對外貿易等問題上，必以美國原則爲主。由過去美國與他國交涉的經驗，更由國際貿易會議美國所持立場上，均可見出美國全副精神均用在如何阻擋基本工業國家化這問題上，同時，他也努力打破各國限制奢侈品輸入的辦法。

計劃執行人得動用計劃中的金錢，來擴大某種稀有軍用原料的生產。如果執行人對此堅持，參與國是難以反對的。當然美國會以代價購買這種原料，不過美國這種操縱力量，可以侵入歐洲某些大企業組合的勢力範圍，——如錫和橡皮——進而使美國可以壟斷世界上稀有的軍用原料

每一參與國內，須設置「經濟合作主管」，常駐該國，督導計劃中「特殊的任務」。恰巧，國務院同時指出：在希臘，因爲美國援助機關已經建立了，就可不必另設主管。

像這種種權利，結果使歐洲會門戶洞開，讓美國銀行界可以大大投資設廠。提交國會通過的經濟合作方案中對這種種辦法，特加保證，十四年內花在這方面的費用，規定爲八萬萬到八萬五千萬美金。是全部計劃中的百分之五。比這要緊的是，這樣的經濟控制，本身就是對美國大企業的一個保證，因爲有了控制，就能破壞歐洲工業國家化的計劃，並可保證美國所有的利潤可自由運回本國。

美國的大企業由此就能通行無阻。譬如煤油企業，就可詳細劈劃，如何在最有利的條件下，控制西歐主要經濟命脈。辦法徹底行通之後，那麼歐洲的地位，就好比現在的拉丁美洲。拉丁美洲現在每年要以出口的百分之四十到五十抵償外資的利潤。這樣的支出，無疑將使西歐的生活水準繼續低落，同時將使西歐日益失去經濟自主權。

掌握着馬歇爾計劃的是美國，凡是參與國不遵守執行人（實際就是國務院）的原則時，美國就可停止這計劃。杜魯門對國會的報告裏說得很明白：「它（馬歇爾計劃）代表我國外交政策主要的一環，它將每天影響我們外交政策的決定，同時受政策決定的影響」：在這樣以經濟干預爲外交政策的手段下，西歐還能獨立到什麼程度呢？

甘地之死

（新德里通信）

嚴紹端

這是人類的最大悲劇：一生宣揚和實踐非暴力的聖雄甘地却於一九四八年一月卅日傍晚的祈禱大會上，以七十九歲的高齡被人槍擊，死在暴力的手裏。

那天傍晚，太陽落下的時候，人們從電台的廣播裏知道了這消息，新德里的電影院和劇場立卽停止演出，商店和餐廳紛紛關門，正在進行中的結婚典禮也宣告延期。人們的感情突然變成了眞空。夜裏八點半鐘，印度總理尼赫魯和副總理巴特爾向全國發表廣播，尼赫魯一開始就泣不成聲的說：「我們生命裏的明燈已經熄滅了，到處都只有

着黑暗。……我們將不再跑到他那裏去聽取忠告，將不再從他那裏得到安慰了。」

三十一日上午，新德里印度門的廣場上擁擠着千萬羣衆，等着對他們的國父甘地的遺體作最後一次的景仰。柩車上，甘地的身體被印度三色國旗掩覆着，國旗上面堆聚着重重的玫瑰花瓣。他的面孔依舊是那麼肅穆虔誠，顯示出他對人類的大愛和他爲人類贖罪的犧牲所換來的寧靜。尼赫魯和巴特爾就坐在他的身旁，尼赫魯紅腫的眼睛裏還噙着淚水，巴特爾則整個變成了一座悲哀的塑像。記得去年八月十五日，我也曾在這塊廣場上，看着印度自由的旗幟在千萬羣衆的狂歡裏升起。六個月後的今天，羣衆中沒有一個人再敢追想當時的心情。

當天傍晚，在舊德里的朱姆那聖河岸邊，依照着印度教的儀式，一堆檀香木焚化了甘地的遺體。他的骨灰已經收檢，定於二月十二日在阿拉哈巴附近投入朱姆那河與恆河的匯流處。從此，每天黃昏，人們將不再聽到他在祈禱會上的和平的聲音了。比拉大廈後面，他被刺倒下的那塊地方，現在已經變成了頂禮膜拜的聖地，而且地面已經被羣衆們挖了一個坑，因爲很多人都想得到那裏的一撮土當作神聖的紀念物。他住過的那間房子也已開放，房間裏跟他身前一樣，除了一個坐墊之外，甚麼傢具也沒有，現在那坐墊上只有他的一張照片，旁邊擺着他的手紡車，還有他最近剛好收到的一頂細甸農民帽子。

對於甘地，死只是他的一個朋友，只是他必須要跨過的一道門檻。他的身軀對於他的靈魂的價值是那麼渺小，即使他事先知道當天他會被謀殺，他也一定會帶着笑向那兇手走去。實際上，他一月十八日剛好停止了最後一次絕食，二十日的祈禱會上就曾有一顆炸彈在他身旁爆炸，他當時一點不動聲色，第二天在祈禱會上勸大家同情那被捕的暴徒，要讓他有改過自新的機會。警察當局根據那暴徒的口供，曾向甘地提出警告，說他的生命有着危險，但甘地却拒絕武裝保護，也拒絕接近他的人被警察搜查。他不願意在他自己和羣衆之間建立起任何人爲的阻隔。幾十年來，他天天跟人民大衆在一起，從來不曾有過武裝保護，要謀殺他也就跟謀殺任何一個印度農民那樣容易。但一直到一月三十日傍晚，才發生了這惡夢裏也不會出現的慘劇。當他中了三槍倒下時，他只接連的叫着：「上帝，上帝！」

他在一月十八日停止絕食後，還曾樂觀的表示希望他能活到一百二十五歲。被刺之前，他還曾爲「哈里眞」週刊寫了最後的一篇文章，希望國民大會黨在獲得了政治自由之後，要繼續努力，爭取社會經濟的自由，並且主張清除國大黨中的腐敗份子，多多吸收來自農村的新力量。他在那篇文章的末尾說：「這裏我只把一片遠景顯示給你們。假若我的時間和健康允許，我希望再詳細討論人民的公僕應該怎樣服務，以便在他們的主人的估價中提高他們自已的地位。」被刺的前一天下午，一位難民代表曾憤怒的請求他到喜馬拉雅山休養去，但他却不願享受山中的和平，願意活在民衆當中，在週圍的混亂裏能夠找取多少和平就找取多少和平。他的存在就像一件完美的藝術作品，因爲絕大多數的人覺得它是一種激勵，也就有一部份人覺得它是一種阻礙。他的死，尤其是像現在這樣的死法，把他幾十年來潛藏在人們心底的影響都給顯露出來了。

他是印度的「大靈魂」，他的王國是建築在人民心裏的，他的城堡是眞理，他的武器是愛而非暴力。他搖着紡車，大聲的思想，用他的愛去洗滌人類社會的罪惡，用非暴力去扭轉時代思潮的逆流。他的生命史也就是印度的現代復興史。因爲他也是一個人，他走過的道路也是常人走過的道路。當他最初到英國去讀書時，也曾西裝革履，學過跳舞，學過提琴，只想着變成一位十足的「紳士」，但是終於放棄了這些虛妄的想頭，把生活方式完全改變，從經驗中慢慢的探尋到了眞理。在南非洲，他的膚色給他招來許多親自的屈辱，思想上朦朧的概念凝定了，他開始應用他的武器從事鬥爭。他以大無畏的勇氣，一面向南非的種族主義，英國的帝國主義挑戰，一面消除印度內部的階級偏見和教族仇恨。他絕食、坐監、非暴力抵抗、不合作、摒棄一切官能的享樂，淳樸而執着的相信眞理，實踐眞理。印度的劃分便他有着直覺的恐懼，他雖然難於挽救這不可避免的安排，但他却站立在幸福與災禍的縫隙間，用自已的犧牲去說服他的國人。教族間的屠殺警告他不要再徒然的呼號教族和諧，不要再去玩火，但他最後一次絕食的目的就是爲了促成教族和諧，他相信他是在救火。終於，救火的人喪身了。他是一個印度教徒，殺死他的也是一個印度教徒。蕭伯納得到他的死訊後，只說了一句話：「這證明人太好了是多麼危險。」人類的聖哲並不是每一代都有，而且，歷史上雖然閃耀着不少光芒的名字，但每一個名字差不多都代表着一個埋葬了的美夢。在歷史家的筆下，在後代人的記憶裏，「遺臭萬年」的人跟「流芳百世」的人也同樣的佔據着一席地位。

甘地是托爾斯泰的崇拜者。托爾斯泰的教訓連他自己的妻子和兒女也難於諒解，結果到了暮年，還不得不夜間出走，寂寞而失望的死去。甘地哩，好像是上帝的意旨要他領導印度得到獨立，他的環境比托爾斯泰幸運，他的教訓在羣衆中產生的影響比托爾斯泰大。也許可以說，托爾斯泰主要的是以他的著作來服務人類，（因爲他在晚年的日記裏，曾經冷酷的拷問過自己：托爾斯泰啊，你是照着你自己的教訓生活的嗎？回答是：不，我慚愧得要死。）而甘地的教訓跟他的生活實踐則是完全一致的，他把他的整體毫無保留的捐獻於爲印度以及爲全人類的服役裏。他的生活方式，就是印度十萬個鄉村裏億萬農民的生活方式，但他的思想方式却跟托爾斯泰的思想方式一樣，是二十世紀的文明教化所不能全部接納的。他的死，全世界各地都獻來「花圈」，但「花圈」獻過以後呢？

甘地自己曾經說過：「甘地可能死去，但甘地主義將永遠活着。」

一位美國記者費契爾一個多月前才在德里出版了一本書，叫作「甘地與史達林」。主要的課題是，今天的世界正站在十字路口，必須決心在兩條路之間選擇一條：一條是暴力與獨裁的路，他稱爲史達林的路；另一條是非暴力與民主的路，也就是甘地的路。向甘地獻「花圈」的各國領袖們應該想到，任何形式的戰爭當然都不是「非暴力」的。

就印度自身來說，甘地的死，在料想中會生出兩種反響！一種是純粹的悲哀所激起的憤怒，對謀刺的兇手及其同黨實行報復；另一種是高度的悲哀淨化成了堅強的力量，用這力量去完成甘地生前不能實現或者實現得不夠澈底的工作。甘地死後的兩天內，孟買、加爾各答、浦那、甚至德里等地的羣衆，因爲謀刺的兇手屬於印度教大會，又因爲 R.S.S. 組織（註）曾於甘地被刺那天傍晚在街頭散發糖菓給兒童表示慶祝，因而襲擊這兩個組織的領袖住宅和機關所在地，搗毀跟這兩個組織有關係的報館，這可以說是第一種反響的表現。證明第二種反響的是尼赫魯和巴特爾接連的發表聲明，表示政府決心遵從甘地的遺訓，對鼓吹教族仇恨的組織和私有軍隊決不加以容忍。現在 R.S.S. 的集會已經下令禁止，印度教大會的一位領袖已經被捕，德里也已調來了強大的軍隊，準備防止任何暴亂發生。同時，印度九省的省督正在新德里跟中央政府舉行會議，商討維持全印度各地治安的問題。

尼赫魯是甘地自己指定過的繼承人，現在全印度的人民都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也只有他能夠實際掌握印度的運命。假若印度人以後不僅對國父遺像作形式上的虔敬，假若甘地夢想中的印度能用一死的代價換來，那他的死將是一個絕大的勝利。

（註：R.S.S. ——Rashtriya Swayam Sevak Sangh 是一個純粹的教族組織，以保衞印度教，復興印度教文化和團結印度教徒為號召，實際上想把所有的回教徒趕出印度，把印度建立成一個印度教國家。該組織的態度比印度教大會更趨極端，更崇尙暴力。據說不久以前，在該組織的一次祕密會議中，有一位領袖曾經說過，他們決心要建立起印度斯坦，而且不惜用一切手段去對付阻礙他們的任何個人或政府。該組織祕密的擁有武器，並且有所謂致死隊。

二月三日新德里

甘地與新印度

（新德里通信）

嚴紹端

甘地的第十五次絕食從一月十三日上年開始，已於十八日中午結束。他第一次絕食是一九一三年在南非洲，第十四次則是去年九月在加爾各答。歷次絕食的原因，不外提高印度賤民階級的地位，促進印回兩教的團結，以及反抗當時英國的統治。其中也許要算一九四三年那一次的影響最大，那次絕食是為了提出「退出印度」的口號而被捕，監禁在阿加漢宮，結果他二十一天的絕食，動搖了英國統治印度的基礎。他為了印回團結問題先後曾絕食三次：最早一次是一九二四年，地點也在德里，當時他曾宣佈，假若他的死能夠換來印度教徒跟回教徒的和諧，他一定樂意死去。最後是阿沙德多方努力，舉行了一個印回團結會議，調解兩大教族的衝突，他的二十一天的絕食也才宣告停止。去年九月，當加爾各答暴動最厲害的時候，他曾不顧生命的危險，親自住在暴動區域以內，三天的絕食竟然壓住了瘋狂的屠殺，造成一個空前奇蹟。現在這一次絕食是一月十二日傍晚在新德里突然宣佈的，而且說這次絕食沒有限期，一直要到德里的各教族間，不藉任何外來壓力，純粹由良心的醒覺而彼此和諧相處，眞正結團時，絕食才會停止。

甘地這次為甚麼絕食呢？去年加城絕食後，他帶着還沒有完全復元的身體來到新德里，並且計劃到巴基斯坦去，但他在這古老而寧靜的京都也嗅到血腥昧，他的直覺叫他在德里住了下來。在這段期間裏，他每天聽到的和看到的是巴基斯坦境內的印度教徒和錫克教徒被屠殺，是來自巴基斯坦的印度教和錫克教難民對於德里回教徒的報復行為。他也看見這些失去了一切親人和財產的難民們沒有足夠的安身之所，沒有足夠的遮身衣服，在大雨裏睡覺，在冷風裏發抖。仇恨與生活使得他們「接收」了回教徒空下的住宅，就是回教徒還佔據着的房子，他們有時也會把主人趕走，甚至搬到回教寺院裏面去住。難民們和回教徒們每天都跑到他那裏去哭訴他們各自的遭遇，但他們都同樣的要求讓他們能夠活下去，像一個自由國度的自由人民似的活下去。同時，克什米爾土邦的糾紛已經超過了直接協商的階段而提到了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關係顯然已變得表面化，兩個自治領都有着不少的人在嚷着戰爭的不可避免。甚至在他宣佈絕食的前兩天，巴基斯坦首都卡拉蚩和西旁遮普省的匹加拉特兩地還發生慘劇，死了不少的印度教徒和錫克教徒。在這種情形之下，這位七十九歲的印度國父心裏會有如何的感受呢？他為了印度的自由獨立，幾十年如一日的堅苦鬥爭，現在獨立雖然實現了，却是在另一種形式之下實現的，他的夢想已經大大的打了一個折扣；更不料這獨立帶來的是自相殘殺，靈魂墮落，古老的文化變成了原始的野蠻。他在高喊「退出印度」的口號時雖然不幸言中，英國人的撤退也許會引起暫時的混亂，但他想不到，也不相信混亂的局面竟會有不能收拾的趨勢。他很遺憾不曾阻止到印回兩教在結婚以前的離婚，他却還夢想着終久會有一個大團圓。他虔信非暴力，他有着滿腔熱愛，但他是一個沒有武器的戰士，當他「內心的聲音」告訴他甚麼時候應該絕食，他便決定絕食。

他在宣佈絕食的談話中說：「對於那些每天都來看我，問我他們應該怎麼辦的回教友人們，我無法答覆他們。我的無能近來常常咬嚙着我的心。……假若一個人是純潔的話，他可以給予的最寶貴的東西莫過於他的生命，他希望而且祈禱我有着那種純潔來辯護我的行為。……因此，我請求每一個人冷靜的檢討我絕食的目的，假若我非死不可的話，就讓我安靜的死去。我與其活着無能為力的看到印度、印度教、錫克教、以及伊斯蘭的毀滅，死對於我倒是一種光榮的解脫。假如巴基斯坦對少數民族不保證平等的地位和生命的安全而印度又仿傚着巴基斯坦去做，這種毀滅是一定會到來的。」他這次絕食期間發表的談話中，曾經好幾次提到死的不可避免和他自己的無能。他這種慘淡幽憤的心情，也許從西孟加拉省省督拉加哥帕拉查理的一篇聲明中更可以清楚的瞭解。拉氏是甘地多年的朋友，年紀也比甘地小不了好幾歲，他曾於甘地絕食的第二天在加爾各答說：「在目前，神智清醒的只有甘地傑一個人。其他的人不是整個的錯誤就是局部的錯誤……我們已經親眼看見了許多空前的殘酷和暴力。當開明的人們都變得麻木不仁時，像甘地傑這樣的人會感覺生命沒有目的。假若我們不能阻止像我們已經經驗過的這些荒謬行為，我們還有甚麼理由繼續的活下去呢？甘地傑在聲明中說，沒有一個朋友像死亡一樣，那並不是矯飾的說法，因為死亡把我們救出一切的糾紛和痛苦。」

甘地絕食期間，德里和全印各大城市都舉行羣衆大會，祈禱大會，領袖們出勸呼籲教族和平，德里街頭更每天都有壯烈的和平遊行。甘地自己接連的說，大家的努力不應該是救他的命，而應該是救印度和印度的光榮。國大黨主席普拉沙在絕食的第一天發表聲明，呼籲建立起各教族間的親善與和諧，他說在英國統治時代，甘地曾經絕食了很多次，但都平安的活了過來，假若現在自己人不能救他的性命，那將是每一個印度人，特別是每一個國大黨員的最大恥辱。反對這次絕食的只有少數難民。十四日傍晚，有一部份難民跑到甘地住着的比拉大廈門前示威，大聲叫着「讓甘地死吧！」的口號。一位錫克教難民在對新聞記者陳訴他的悲慘遭遇之後，憤慨的說：「根為了保護回教徒而死的人是不配活着的。」另一位難民却表示意見說：「政府為甚麼不宣佈一項計劃，在德里建築四萬間房子給難民住呢？要解決教族問題，這樣的計劃比絕食有效得多。」十七日傍晚祈禱大會之後，德里民衆四千多人的和平行列正從甘地的床邊繞過，恰好一批難民又到比拉大廈門前喊着反甘地的口號。這激怒了那些參加和平行列的人，假若沒有警察干涉，也許在甘地為和平絕食的床邊就會發生意外的不幸。因為難民們的經歷裏只有仇恨和憤怒，他們難於瞭解甘地的大愛和深心，以為甘地的絕食是在袒護回教徒。

這次絕食的影響不能說不大。印度總理尼赫魯，副總理巴特爾，教育部長阿沙德等兩次跟甘地舉行長時間的密談之後，十六日便正式宣佈了兩項重要的決定。一項是尼赫魯親自在羣衆大會上對難民們保證，現在沒有住處的人將在一個禮拜之內得到安身的地方。政府並且已在德里附

近劃出了一塊廣大的區域，為難民們修建房屋。現在在德里的難民共有四十萬人左右。第二項是印度政府決定立即實踐與巴基斯坦訂立的財政協議，將五百萬盾盧比的現金付與巴基斯坦。記得巴特爾在宣佈財政協議的條款時，曾經明白的說過，希望巴基斯坦把這協議看作印度的親善表示。他又說明，協議的圓滿實踐要靠雙方面繼續保持着寬大和妥協的精神。換句話說，那就是要克什米爾問題有了好轉，巴基斯坦不再對侵略者予以支持。但實際上，巴基斯坦對於克什米爾侵略者的態度依然沒有改變，而且問題越鬧越複雜，弄到提交安全理事會去解決。於是印度政府決定五百萬盾盧比的現金暫停付款，因為這筆錢的用途顯然會對印度自身不利，那等於把手槍借給一個準備謀害自己的人。但是為了甘地的絕食，印度政府竭盡一切可能的努力，以便建立起親善與和諧，使甘地早日停止絕食。經過尼赫魯等跟甘地商量之後，才作了這樣的決定。甘地對於這決定表示非常愉快，當天傍晚，他在對祈禱大會的書面談話中說：「任何責任內閣改變其既定政策，決不是一件平凡的事情。但我們的責任內閣却以同樣的審慎和敏捷變更了它的既定政策，這是值得全國衷心感謝的。……但促成這種決定的是甚麼呢？是我的絕食。沒有我的絕食，他們是不會超過法律允許他們或需要他們做的範圍的。」同時，他希望印度政府這種親善的表示會在巴基斯坦引起反響，使得克什米爾問題跟兩自治領之間的一切糾紛都得到圓滿解決。在宣佈這項決定的政府公報之外，尼赫魯還發表了一篇聲明，似乎煞費苦心的解釋政府這種決定並不是改變了他的同僚們歷次聲明中一致表示的意見，不過是遵從印度的光榮傳統和甘地的崇高教訓，使世人相信印度是誠懇的希望着和平與親善。至於克什米爾問題，他說印度政府的立場沒有改變，並將實踐其對於克什米爾民眾的諾言，使他們獲得自由。他又在一個羣眾大會上駁斥關於印巴戰爭的流言，但他說，假若有任何緊急事件發生時，印度軍隊的實力是足以應付的。

最近七八個月來，尼赫魯憂患集於一身，嗓音比從前嘶啞，臉上添了許多縐紋，看去至少蒼老了十年。平常他每天都要到甘地那裏去，這次絕食期間，他更是不離左右。第三天以後，甘地身體變得微弱，不能多作談話，他也在甘地身邊默默對坐。據說他也曾暗自絕食，不過沒有讓人知道。由於他跟阿沙德，普拉沙等人的努力，甘地在十七日提出了他準備停止絕食的條件。於是普拉沙以國大黨主席的身份，跟德里各教族代表連夜舉行會議，全體聯合簽名向甘地保證，絕對做到甘地提出的各項條件。該項保證於十八日中午在甘地面前宣讀，甘地認為滿意之後，整整五天的絕食便宣告停止了。保證的條件是：回教徒們可以自由的慶祝即將到來的一個宗教集會；非回教徒自動撤出佔用的回教寺院和住宅；回教徒的行動有充分安全保障；不對回教徒經濟絕交；已經離開的回教徒可以自由的回到德里等。絕食停止以後，甘地曾發表談話，很樂觀的希望他能活到一百二十五歲，希望保證的條件都能夠真正做到，同時，不僅德里要保持和平，其他各地也應該保持和平，印巴關係也應該融洽無間。他又宣佈，假若必要時，他是不惜再來一次絕食的。假若德里能讓他走開，他準備到巴基斯坦去。

巴基斯坦方面對於這項絕食也曾表示關切，甘地收到的電報有許多就是從巴基斯坦寄來的。但到目前為止，巴基斯坦還沒有甚麼實際的反響。五百萬盾盧比的問題，他們認為印度在先的扣留是不正當，現在決定發放，似乎是理所當然。巴基斯坦外交部長沙弗魯拉曾說，假若甘地想用絕食的方式來促進教族和諧，這事實却不能用作對巴基斯坦的一種壓力，叫巴基斯坦去做違反她自己良心的事。甘地的看法則以為，要是在印度只有黑夜，在巴基斯坦也就難於找到光明，一切得從印度自身做起。他一向在祈禱大會中都要唸可蘭經，曾有少數非回教徒因此在會場搗亂過，請他不要唸。以後他真的到了巴基斯坦，跟那些信奉可蘭經的人住在一起時那將是試驗他的力量的另一個機會

甘地的第十五次絕食是結束了。有人曾經問過他，他認為這次絕食應該歸咎於誰。甘地說他不歸咎任何個人或任何教族。他相信，假若印度教徒和錫克教徒一定要把回教徒趕出德里的話，他們將出賣印度和他們自己的信仰，那會使他傷心。他又曾同時提到巴特爾，說有許多回教徒指責巴特爾最近發表的一些談話，因為巴特爾說過，留在印度自治領的回教聯盟的人員是不能一下就變成朋友的。甘地勸告回教徒們不要責備巴特爾，而且要用實際的行動來證明巴特爾的說法不正確。甘地說尼赫魯的作風雖然與巴特爾不同，但尼赫魯却認為巴特爾是一位難得的同僚。假若巴特爾是回教徒的敵人，尼赫魯是可以「請他退休」的。

巴特爾是國大黨領袖中有名的「鐵漢」，很多人把他性格的剛強和史太林相比。他原來也是一位律師，當甘地從南非洲回到印度後，有一次曾到阿梅達壩俱樂部裏去，巴特爾和別的許多律師都在那裏。甘地走進去時，巴特爾仍繼續玩着他的紙牌，看也不看甘地一眼。但以後，他真正的認識了甘地的人格和理想，馬上轉變成了甘地的信徒，絕對聽從甘地的意見，因此，國大黨中人都親暱的把他叫作甘地的「Yes Man」。現在不知怎麼的，甘地自已說巴特爾已不再是他的「Yes Man」了。巴特爾自已哩，他於甘地絕食的第二天因事離開了德里，十六日曾在孟買市政府的歡迎大會上致詞。他這篇坦白的演說，也許可以幫助我們瞭解甘地與新印度的關係。他說：「甘地傑的絕食，各方傳說紛紜。事實是，德里雖然有着和平，但甘地傑說這種和平是用武力維持的，不能表示心的團結。甘地傑是在我們不能到達的高處說話、思想、和行動的，我們希望能夠到達那裏，但我們根本沒有那樣的能耐。他在那高處，不會受到憤怒或惡感的支配。他充滿着愛和感情。假若我們有他那樣一顆純潔的心，我們一定會知道個中的區別。因此，我們不能像他所喜歡的一樣來治理印度，我們必須要保持警察力量和強大的軍隊。……有一部份回教徒曾跑到甘地傑那裏去埋怨我最近的演說，因為我曾批評他們不斥責巴基斯坦對於克什米爾問題的態度。他們還告訴了甘地傑許多事情，以致甘地傑覺得要替我辯護。那也使我痛苦，因為，我畢竟不是一個弱者，要讓別人代為辯護。」巴特爾接着又說：「甘地傑開始絕食時，我們就覺得可以把情勢弄清楚。因為，當我們正在揮金如土時，假若五百萬盾盧比的現金付款可以使得甘地傑稍微安心的話，為甚麼我們要吝惜這五百萬盾呢？我們希望這將從巴基斯坦方面得到一些反響，但是，假若巴基斯坦沒有反響，那過錯是在我們身上。我們不能不拉攏民眾，但我們也不能不想到甘地傑。我們看得近，他却看得遠。……我們必須要造成一種環境，使巴基斯坦可以走它喜歡的路，而印度也可以走自已的路。……我十分坦白的告訴你們，假若由於我在中央政府所做的事情而我被監禁的話，我一定表示歡迎。因為，根據我的經驗，我發覺監禁還要甜蜜得多。」巴特爾就像別的領袖一樣，在爭取印度獨立的日子也曾嘗過很多次鐵窗風味。

現在，也許我們可以說，在印度人民大眾中，希望有一個強大印度的都相信巴特爾；希望有一個強大印度，還希望有一個幸福世界的都相信尼赫魯；希望每一個印度教徒，回教徒跟錫克教徒的心裏都只有上帝而沒有撒旦，只有愛而沒有恨的則都相信甘地。至於那些不真正懂得非暴力抵抗的意義，只想到祈禱大會上去聽聽甘地的聲音，或者可能時摸一摸他的腳的人，他們對於甘地的虔信又另外是一種形式的。年青人大抵都會有一種感覺：假若莎士比亞沒有寫過哈姆雷特，也許別的劇作家在寫類似的劇本時會少一些顧忌。

一月廿日新德里

從戰局看政局

觀察記者

（觀察專稿）

「軍事是政治的延伸」。世界上沒有單純的軍事，從每一個戰爭的起因歷程和結束來看，都含有濃厚的政治因素。所謂戰爭，不過是兩個以上的國家或集團有了不能解決的政治問題，而訴之於武力；但是打到最後，或輸或贏，還得是政治解決。心病還得心術醫，解鈴繫鈴，是非常自然的道理。戰爭是人類歷史歪曲的道路，好像是庸醫亂投藥劑。因此，就是世界上的被損害被侮辱者，基於對歷史的仇恨，創造了鬥爭的理論，但是他也時常呼喚着「要麵包，要和平。」

中國的內戰也不例外是個政治問題。

「政協」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極有光輝的標誌。可惜他曇花一現，又被硝烟彈雨所粉碎了，使得中國歷史又倒退了十年。某內戰英雄對他的屬下知識份子說，「今後不准對政協一類的東西，存有半點幻想。」這話的另一方面，也說明了他的屬下知識份子難免還在憧憬着政協的光輝。歷史是不會重演的，用不到大人先生諄誡，政協過去了，政協就不會再來；但是希望和平是全國人民一致的願望，如何獲致和平，需要有新的道路。

萁豆相煎的內戰打了兩年多，現在還看不到半點可以結束的跡象。過去所謂「長痛不如短痛」的理論，到現在充分的證明了是錯誤的，就不必說「短痛」不如「不痛」好吧，其奈短不起來何！「內戰一起，必然是長期化的」，以前有人這樣警告過，但逆耳之言，是沒有人聽的，到今天相信三個月如何，六個月如何，乃至一年如何三年如何的人，是應該有所反省了。應該拋開意氣，面對着中國人民的苦難，中國之命運，以及個人的政治生命，深切的反省一下。

國軍的軍事力量原是遠過於共軍的，以兵員論三倍於共軍，以裝備論五至十倍於共軍。打了一年多結果怎樣呢？爲解除京滬威脅，一九四六年夏進兵蘇北，爲解圍大同，切斷共軍東北西北的塞外走廊，攻佔集寧張家口承德。同年爲了爭取沿海貫徹南北合縱的戰略，集大軍於徐州外圍，進出山東，東北也趁機下安東。一九四七年春爲了摧毀共軍政治中心，胡宗南進兵延安。到同年七月國軍的攻勢達於最高峯，將所有的軍事力量百分之八十五投擲於各戰場。共軍因爲機動的避免主力決戰，除了趁機吃掉國軍的一部分外，沒有大的會戰。當胡宗南部進駐延安時，曾電駐守榆林的老將鄧寶珊，要他「活捉朱毛」，原電大意說，我軍以雷霆萬鈞之力，進駐延安，朱毛狼狽北逃，望兄迅速出兵截擊，活捉朱毛。那位久經世故的鄧老將軍，根據他自已的判斷覆電胡宗南祝賀之外，問詢共軍實力損折如何，他說，如果朱毛兩人落荒而逃，弟部當有活捉力量，如果他實力未受損失，整師北撤，榆林局勢更危，自衞不暇，遑云截擊，且以貴部數十萬衆不能在延安活捉朱毛，榆林一隅兵力，難做海底撈針之計。

共方宣稱從一九四七年七月以後就不在解放區作戰了，而是在政府區作戰。他們更認爲一九四七年下半年是國內戰局的轉折點，從那時起，他們展開反攻，走向勝利，無疑的戰區是較前擴大了，國軍也有相當的傷亡，尤其在東北一次連接一次的攻勢，一次比一次大，一次比一次向南。黃河與長江之間，南北東西縱橫近千里，都有了共軍的蹤跡。這一個現實的局面，不能不使得原來計劃三個月怎樣，六個月怎樣的政府軍事當局有些焦灼。而且國內政治經濟的局勢，絕不容戰事久拖。第二線兵團的準備及軍事指揮機構的調整政府已經着手實施。去年陳誠出主東北行轅，白崇禧指揮華中軍事，傅作義出任華北剿匪總司令，可以看做政府在軍事指揮上的攤牌。但是整個的局勢，並沒有因爲這次攤牌而扭轉過來。現在除了兵源糧源問題外，在裝備與彈械上，美國租借軍火和勝利接收百萬日軍裝備，經過近兩年的消耗，存底恐怕也大不如以前了。戰時千架的飛機，經過兩年的使用，壽命也縮退了，這一切人以外的物質條件，都不得不謀補充與解決。太平洋彼岸的軍火現在雖然還有的來，以現在供給的數量，也難以夠二三百萬軍的消耗。今年春天就是一個重要關頭，共軍在「北邊緊打，南邊緊竄」的當中，國軍也不能以單純的防禦來阻止共軍的進攻。他一定一方面加緊外援的活動，一方面在積極部署，繼續調整指揮機構，厲行軍事體制。現在華北東北已設剿匪總部，並且在長城線上東北華北兩轄區的邊緣，打了一個補綻，由范漢傑兵團維護北寧路關內外交通，支援東北，掩護華北，使東北草原上的寒流，不能一直衝進關內來。華中，西北最近也可能設立剿匪總部。華南方面由廣州行轅主持粵桂聯防，湘粵聯防。長江上游也預爲佈置，大巴山設防，川軍東下，潘文華坐鎮宜昌，掩護三峽，做爲防守的前衞。這一切措施，一方面是應付共軍今春的北打南竄。另一方面也可能在分區負責下，展開一個春季攻勢扭轉過去半年來的頹勢。

據權威人士觀察，今年的戰局一定向南北兩端發展。共軍在他絕對優勢的東北地區，一定要趁着冰雪未融，鐵路港口不通的時候，加緊圍困瀋陽及東北其他各重要據點，使東北成爲一盤死棋；然後秣馬厲兵向長城線內冀察地區進攻，打擊傅作義部。他們在宣傳今年要打下瀋陽做爲總基地，打垮傅作義部，整個控制華北。目前東北共軍給衞立煌的「下馬威」，是在這種目標下進行的。國軍要想轉振東北華北的局勢，只靠增設新的指揮機構和實施戰時體制是不夠的，必須再增加現有兵力的二分之一乃至一倍。所以北方的某政府人士說，「加將不如增兵。」可是新增加的兵從那裏來呢？五大練兵區剛剛看到一紙命令，「新貨」不會很快的出廠，而且在兵源上也不是沒有問題。南方現有的兵力是沒有方法調過來的，共軍爲了貫徹他北邊緊打的策略，一定在南邊緊竄，使國軍抽調不到北方來。從黃河到長江，這個廣大區中，經過去年半年的推磨兜圈，國共勢力交錯，糾纏在一起，誰也得不到休息與擺脫戰鬥。共軍已經將去年做爲主戰場的山東丟在背後，浦濟車可以暢通無阻，但山東的廣大農村還在共軍手中。遠離基地作戰的共軍可以實施「空心戰術」，國軍在很多地區甚至於單純的後方，也不得不需兵力警備。當然遠離基地的共軍，在補給上不無困難，最近劉伯承陳毅部隊的越隴海路北竄，也說明了他們的困難，是爲了接近基地，接受新的補充。不過在他衞到國軍後方時，地方團隊很容易被吃掉。「消滅地方團隊，拖死國軍」是共軍二陳一劉過黃河向南反攻的主要理想。現在國軍雖然不曾拖死，而地方團隊却已經吃掉了不少。有名的宛西團隊也在鄧縣被打垮。

截至目前爲止，共軍的兵源糧食都不成問題，可是攻堅的力量還是不夠。因爲他沒有空軍和比較可用的重兵器

，就是在他絕對優勢的東北也不能例外。這一點也可以說明了共軍沒有得到什麼外援。他的主要的補給還是在前方。由於裝備及戰爭的性質，他不得不運用他特有的戰術，從他的戰術指導原則上，我們很容易窺測他的動向。放眼看戰局，我們覺得今年戰事一定要向南北兩端發展。——北邊緊打，南邊緊竄。

戰術決定於戰略，有人說共軍的戰略企圖是「鞏固東北，控制華北，鑽隙西北。」「突入江南，號召東南，影響西南。」果眞是有這樣的戰略企圖，也必然是「北邊緊打南邊緊竄。」共軍的戰術是什麼呢？他們深知道劣勢裝備的部隊，打強變弱，打弱弱變強，主要的還是運用游擊戰與運動戰，不攻堅，避免主力決戰，不重視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注意有生力量的轉換。先取小城市和鄉村，運用造成的局部絕對優勢吃小部隊，打下孤立據點。注意自已部隊的休整，而同時疲勞攻擾對方。他們這一些戰術原則，國軍方面也不是不知道，而且各級參謀指導機關，也在細心的搜集資料加以研究，籌劃對策。但是由於羣衆基礎不同，現在還看不出國軍有效的對策。穩紮穩打吧，動作遲緩，失去了機動性。利用碉堡吧，防禦了自己，也限制了自己。機動掃蕩吧，地雷地道，不得不搜索清除，不然共軍零整互換，來去飄忽間，難免吃虧。要想以靜制動，現在不是抗戰前江西圍剿時期，要想以動制動，鄉村中的羣衆基礎不夠，而一般部隊的行軍力也不如共軍。經濟政治問題不談，在單純的戰術上就是一個極爲困惑的問題。

非正式的消息，說國軍應付今年共軍「北邊緊打，南邊緊竄」的戰略，是要「肅清華中，鞏固華北，收復東北」。這一個新的戰略企圖，比以前所傳說的守住東北，鞏固華北，控制西北」的調子並不高。著言收復，不如守得住更現實一點，所謂收復是丟掉以後的事。現在具有濃厚象徵意義的吉，長，四，瀋，錦等大據點還在國軍手裏。鞏固華北無疑的是戰略上的守勢，當然在戰術也可以攻代守，傅作義「以退爲進」的軍政作風，担任這個任務是非常理想的，北方地方人士及中央也相信只有他才或者能夠達成這個任務。可是「世界上沒有奇蹟」，傅作義出任華北五省聯帥時，也說過這樣的話。由於他的警覺性高，華北現有各大城市及交通幹線今春或許不至於有大問題，在某種情形下平津也不見得比京滬危險。肅清華中的任務是比較更艱鉅一些。從黃河到長江，西起巴陝，東至海陬，縱橫千里，山嶽，平原，湖沼，雜然並陳。共軍在他的「三南」策略下，渡江入川爲主要兩大企圖，他必然還是避免主力決戰，飄忽不定，主力是難以捕捉的，捕捉不住主力，肅清華中從何說起呢？國軍也或許到今年秋季得緊急號召肅清江南或華南。國軍戰略與戰術間有他的矛盾存在。戰略是大體固定了，戰術還須再加以研究與檢討。

國軍在戰術上目前還看不出什麼辦法。所以政府中人士檢討過去一年戰局時，只好說，「在此一年中間，國軍由總動員起，開始對匪進剿，首先達成克復共匪政治中心之延安，搗毀共匪軍事供應基地之沂蒙山區。打破共匪海上外援惟一補給線之烟台等海口，獲得政略和戰略上的勝利。」可是這個政略與戰略上的勝利對目前的戰局有什麼影響呢？不過是多揩在身上幾個包袱。由於戰略上的成功與勝利，更加重了戰術上運用的困難。

內戰開始時，國軍在戰略上要求南北合縱，爭取沿海。共軍要求東西連橫，丟開大城市，全面控制鄉村。經過去年陳賡劉伯誠陳毅的南下，八方風雨會於中州，從黃河到長江形成了軍事大轉盤，於是縱橫的戰略要求混亂了。共軍大踏步南進，使得國軍作戰指揮部裏的「匪我一般態勢圖」上的紅藍線，天天在變化着，調整部署，轉移箭頭的方向，忙個不休。共軍的南下，也使得整個河南，半個安徽，半個湖北，都成政府所習稱的「綏靖區」。另外丟掉了晉南晉西，丟掉了河北中部東西兩線的大據點石門與滄縣，在長城線內外，共軍重入冀東，重入熱河。一九四六年七月到一九四七年六月一年中間國軍所獲得的面積，到一九四七年底，除了幾個少數的大據點，差不多又完全被共軍拿回去了。政府爲了解除京滬威脅用兵蘇北，蘇北的鄉間到現在還不安定。爲了打通南北通路，爭取沿海，進兵山東，到現在沂蒙山區裏還有共軍，膠濟路依然不通，烟台威海衞外圍還有戰事。津浦路線徐濟段的通車，是在雙方經濟輸血的共同願望下，到現在倒還沒有問題。延安雖仍在國軍控制下，而中共中央還沒有離開陝北。至於東北共軍，在一年的七次攻勢中，使得鐵路寸斷，工礦破產，除了幾個富有象徵意義的大據點吉，長，瀋，四，錦外，不但是「面」沒有了，「線」也沒有了。國軍在東北所控制的面積，僅佔東北全面積百分之六七。在內戰開始，中共宣稱解收區人口爲一億三千萬，控制縣城三百多個，現在打了一年多，就是官方的統計報導，也還是說，「全國被匪控制的區域與人口約佔全國總人口面積四分之一。」照這樣說，起碼是打了一年多，只有軍隊的調動，而解放區的大小在實質上是沒有受到損害與變動的。關於軍事有生力量的折損，共方宣稱國軍已担失一百多萬，但國軍方面說，國軍傷亡失蹤近四十萬，國軍殲滅共軍在一年中有三個縱隊，兩個師，五個旅，擊破共軍十五個縱隊，十個旅，全年共斃傷共軍六十三萬八千名，被俘及投誠共軍十二萬七千餘名。合計爲七十六萬餘名。中國軍事理論家蔣百里先生，對於戰場上的傷亡有一個比較簡單而近於事實的計算法，那就是將兩方宣稱的數字加起來再用二去除，所得之商就是接近事實的數字。共軍說國軍有生力量折損一百二十萬，（指正規軍）國軍自稱爲四十萬，那末加起來就是一百六十萬，被二除開，約得八十萬，共軍自已死傷的數目他還沒有正式總計宣佈過，總之，絕對不會少於國軍，可能比國軍還多一些，從這些未可盡信的數字估計，我們一年多的內戰，是有二百萬青年壯漢直接死於炮火了。其他婦孺及村級地方幹部的傷亡還沒有計算在內。想來是多末可慘。

戰亂二年，數百萬生靈的無謂犧牲，三四千萬難民的流離失所，這是中國歷史上的空前刼運，這個刼運，由誰造成的呢？將來歷史會有定評。現在是萬物新生的春天，然而春天並不會給中國人民帶來新生與幸福，在今年的春季裏國內會有更劇烈的撕殺。這將是中國內戰的最高潮，但高潮之後也不會馬上結束戰爭。人民一時還沒有力量制止內戰的火燄，國際兩個壁壘對立下，對中國政局影響更壞，有的時候難免火上加油，使得中國情勢益形惡化。同時國內第三方面的力量在兩方夾攻下日趨削弱，所謂自由主義者也不能形成一種力量。這一些悲觀的條件擺在人們的面前，向前看是一片漆黑，毫無出路，再加上生活物價的高壓，更使得人有氣無力，對現局沒有方法看下去。於是頹廢，牢騷，聽天由命。這種世紀末的心情，表現在每個階層裏，這實在是一種損失。國人，尤其是輿論界，今天應當有理想，有勇氣，說幾句代表人民意志的話。不應當畏首畏尾的談國際不論國事。更不應該看風向問行情，來決定取捨。一般人特別關心戰局，逢人便想問個究竟，而忽略了自身想打算怎樣，不盡言責，不盡職責，這也就是以上所說的那種不

陝晉戰局與胡宗南部

觀察特約記

（觀察西安通信）以整個戰局發展態勢來看，西北戰場已暫時被拋在後面，就是說，已經不是一個主要的戰場了。自從去年胡宗南部董釗，劉戡兩軍以鉗形攻勢進擊延安，並攻取該地後，陝北戰場就成了國軍的一個不大不小的累贅。共軍抽出了大部兵力西入山西，只留下少數兵力來「看着」延安，而國軍為了政治上的原因，也可以說為了面子關係，不得不以陝境的主力留置在延安。在用兵上，國軍輸了一着。原來胡宗南所計劃的底定陝北，竟因為延安這個贅瘤，到今日還不能實現。相反的，共軍控制了晉南，由晉南渡江又擾亂了豫西，才發展成今日「八方風雨會中州」的局勢。

有戰略眼光的人，莫不以取延安為失策。九個月來的胡宗南，感到莫大的苦悶，培養了十年的精兵，在今日這種「戡亂」時代中，胡宗南的聲威應該是不讓於傅作義的，可是傅作義竄紅了，而胡宗南反而是默默無聞。據說在南京所舉行的西北將領會議席上，胡宗南默無一言，而馬鴻逵倒反而極受重視。醞釀中的西北剿匪總司令部，遲遲不能設立，因為馬鴻逵不願受胡宗南的節制。假如軍事指揮不能統一，還不如乾脆不成立統一指揮機構。在南京時，胡宗南所得到的指示是要他轉移兵力到晉南來。他從南京回來後，即開始這一軍事行動，在陝州，靈寶的他的整編第一軍董釗部渡河進擊，另外一支部隊由陝東渡。最起初的十天，行動還很順利。西安的一位有地位人士表示在舊歷年前可以完全收復晉南，或可與太原的閻部會師。可是天不從人，晉南的重鎮運城，在失而復得後，又傳情況不明了，使得樂觀的氣氛又烟消雲散。

北平的報紙上都喧[illegible]。戰局用不到閻，就是政局如果沒有新的開展，戰爭一時的輸贏，解決不了中國問題。中國一切的希望應寄托在人民的自覺上。

如果從戰局看政局，我們覺得今年中國政局有關展的希望；原因是人民已經普遍的有了覺悟，「長痛不如短」，的理論已經不存在了，長期戰亂人民是無法再忍受的。同時春間就是一個戰局的大關鍵，三月二十九日召開國大又有延期的傳說，不論延期與否，三月廿九日前後，長江下游的大江南北，是要有戰事的。張羣內閣的十項自助計劃，是取得外助的香餌，也可以說是取得外助的外衣。記得張羣內閣登台時，據說他的一個老朋友問他靠什麼撐過危局呢？他說，「要靠三爺」。什麼是三爺呢？那就是兵老爺，洋老爺，天老爺。他希望兵老爺打勝仗；洋老爺給外援；天老爺風調雨順，五穀豐登。結果天老爺還幫我們的吏部天官的忙，各地的天災還不如人禍。洋老爺就有點不甚講情面，扭捏了一年，五億七千萬的外援才逐漸具體化。就是拿得恐怕也[illegible]之交。兵老爺如何呢？前邊已經談過戰局經過概況，這裏不必多說。雖然如此，標榜「效率」，「民主」的內閣，在目前儘管不斷的受攻擊，一時不會更易的。就是以現在的局勢為基礎，行憲大選以後，也還是有蟬聯的可能。軍事上不會有奇蹟，政治上也不會有奇蹟，說他沒辦法嗎？誰會有辦法呢？就是把發表公開函嘲罵他的王纘緒請上行政院的寶座，恐怕也幹不了三天。這個隨着戰局向下拖的政局，不會因為換上一兩個院部會首長而有辦法的，要有辦法得做根本的改革，需要人民真正能以自由的監督政府。政協的路是被一年多的砲火轟燬了，工人，學生，輿論界，須要勇敢的啓迪人民，使得要和平要飯吃的民衆起來，為自己的利益奮鬥，從廣泛的民衆運動中開拓出一條新的道路。這個工作是更艱苦的，具有獨立人格的人為了人民要揹起十字架。目前政府的危機不在軍事而在政治，不過在軍事上表現出來的更具體。人民的自覺運動會隨着生活的煎熬日益普遍深入，某些人想藉制人民。停滯中國社會進步的妄圖，也會隨着經濟危機日益嚴重而幻滅。當然一切的垂死掙扎也是幻滅前必有的現象。往遠處看我們沒有悲觀的理由。折磨是鍾鍊，壓制是激勵，現實與真理永遠教育着人民使他不倒不盲。走上歷史的新道路。

由於一般人特別注意戰局發展的心理，毫無疑意的戰局會直接影響到政局。人類有沒有高度的智慧，在槍林彈雨血肉橫飛的慘景下最容易看得出來。「仁者不懼，智者不惑」，我們基於愛國家愛人民的熱誠，熟審戰局的發展，從而診斷政治的脈搏，經濟的動向，循環應用，做整體的瞭解。

中國這個具有百年殖民地資格歷史的國家，所有依附於國際資本主義的城市，徒有現代化的外衣而是消耗的；而窮困落伍的鄉村不管他的生活方式如何還是生產的。城市代表着帝國主義的勢力，不斷的吸吮着鄉村的血來貢獻外主滋養自己，所以百年來也形成了沿江沿海不少世界知名的城市。城肥鄉瘦的結果，形成了城鄉的尖銳對立。特權者集中都市，貧困農民餓死鄉曲。仔細的想想，今天中國的局勢就只有一句話，那就是「城鄉對立」。軍事上是城城鄉對立，政治上是城鄉對立，經濟上更是城鄉對立。我們的張院長十項堂皇的自助計劃中，只有倒數第二條才提到了「發展農業生產，改善農村經濟，實施土地改革……」真的假的這不過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陪襯。這一項最後還有輕輕的一筆是就「中美農業技術合作建議中其可提前實施者儘量提前實施」來向友邦送秋波。中共方面在戰時根據政府法令，在農村中實施二五減租，他能夠在敵後控制廣大農村，這是主要的原因。內戰開始後他才開始沒收土地，在嘗試着澈底解決中國土地問題辦法，當然這樣也解決了他們的兵源糧源問題，去年十月裏解放區召開了一個全國土地會議，通過了「中國土地法」，共區各地已經開始嚴厲實施。他們的注意力是大半用在鄉村，所以在鄉村中他有經濟基礎與羣衆基礎。政府將怎樣解決農村土地問題呢？現在還沒有具體辦法，即使有辦法也沒有人去執行。因此城鄉對立的局面只有日益加深，一方面是想以城市控制鄉村，一方面是想以鄉村圍困城市。將來是城市制服掉了城市？還是農村吃了農村呢？

城鄉對立的存在是不合理的，在政治上誰能調和城市與農村的利益，使他不至相尅而相成，誰就算是有辦法，我們不要被砲聲震昏了頭腦，要理智的想一想問題。沒有不能結束的戰爭，從問題的基本上想辦法找出路，路總會有的。軍事問題的發生由於政治，政治問題的發生又由於經濟。城鄉對立的現象表現在軍事政治經濟乃至思想文化各方面。中國需要和平，中國需要統一，和平統一的基礎應當建築在城鄉經濟的互相調和上，放眼看政局，還都是只顧了軍事的爭吵，而沒有人肯在這一點上下工夫。選舉的表演，香港的活動，在旁觀者看來，不知他們在搞的是什麼東西，他們是否也曾攷慮到這個迂闊一點的基本問題。

今後的戰局會更緊密而直接的影響到政局，但是戰爭並不能解決中國問題。

二月十五。

淚眼看東北

高超

（觀察瀋陽通信）

隴盡冬殘，苦難的東北，並沒因春天的降臨而獲得片刻喘息；在震天撼地的砍殺聲中，東北依然在嗚咽啜泣，像一個遇人不淑的少婦，在怨恚着自己底命運。

東北早就有中國「煤鐵之鄉」及「糧食倉庫」的稱號，所以我們慘勝之餘，「頭可斷，血可流，東北不可丟」「抗戰即為收復東北」，等等悅耳動聽的口號，又弄得人眼花撩亂了。但是勝利兩年多以來的東北，究竟落得一番什麼模樣呢？我們底「煤庫」「糧倉」看守得如何呢？說起來眞令人難以置信，在「建設東北」這諷刺性的口號下，我們高高在上的廟堂之士，只不過用這韌性的「生命線」勒緊了自己底頸項而已。

勝利後，東北的工礦，即成了接收大員們的追逐目標，因此有許多廠礦，在蘇軍搬運拆卸之餘，便又遭受了「接收劫」。我們試從資委會的六大礦說起：所謂六大礦係指撫順、阜新、北票、西安、本溪、烟台而言。其中西安、北票二礦，在共軍五次攻勢時，即已被攻陷，（同時棄守的還有營城子煤礦）損失數目，至今沒有確切的統計。撫順礦在五次攻勢之初，便又遭受了一次「內戰劫」；那時撫順成了戰區，當地駐軍為修築碉堡，礦上的器材如鋼板、洋灰、鐵筋等被徵用一空，損失當時估計在流通券七十億以上。撫順礦在五次攻勢前每日產量已達五千餘噸，它擁有遠東最大的露天礦，本來年底可達萬噸的計劃，但是經駐軍的「洗劫」後，去年六月間每日的產量須降至一千噸，僅夠維持發電廠所需用，比起日寇統制時期的最高產量四萬噸來，眞不可以道里計，所以當時有人說，共軍沒來，撫順礦便已搖搖欲墜了，要是沒有護礦的駐軍，也許還能維持得長久點呢。那時的礦當局只是忙於撤退眷屬，誰還管他娘的什麼工作？此後撫順礦便一直走上了下坡路，不但產量老在三千噸左右打圈子，就是開採也不按正當的規則了。譬如露天礦，在日寇投降時的一二年以及蘇軍佔領期間，已經不顧礦的剝離工作，（即將煤層上的岩石層剝離，油頁岩層是壓榨汽油的原料）僅以多產為目標，日久之後，便只能採出礦坑附近的煤，廣大蘊藏的煤層，便沒法開採了，接收之後，本應先從事礦的整理，完成剝離工作，但是由於局勢日甚一日的飄搖，正常的工作，早沒人顧及了。現在撫順大部的礦井，陷於完全停頓，僅仰仗着露天礦的出產支撐局面，目下雖然撫順是東北各礦中唯一開採的煤礦，但是在風雨飄搖的局面下，它已頻臨危境。

阜新煤礦是六礦中產量最多，煤質最好的一個礦，其埋藏量為十四億噸。卅五年十月由資委會接收後，預計本年底恢復日產八千噸，估東北用煤量的百分之四十。去年十月被圍，該礦規模最大的新邱礦毀於炮火。於是產量減少了五分之二。其後新立屯壘戰，局勢日緊，在四面楚歌中，生產陷於完全停頓，由於電力缺乏，礦井大半被水浸沒，這個在東北首屈一指的大礦，就這樣急遽地倒塌了。十二月中旬該礦的總經理郭象豫跑到錦州，搭船到天津，想方法撤出了礦上的大批職員，「他說礦上儘管不能工作，賬目還是要繼續作的。」（見一月十六日大公報），至於賬目要作多久，外人不得而知。

本溪煤礦，雖沒遭破壞，但是早就陷在重圍之中與外界隔絕了。瀋陽本溪間的鐵路，自十二月後時通時斷，像是患了氣喘病。職員一部撤退到瀋陽，生產早就停頓。距瀋陽近在咫尺的烟台煤礦，在共軍六次攻勢之初，便被捲入炮火的漩渦中，出人不意的突襲，將烟台礦的職員們逐回瀋陽。治安當局雖在報上大吹大擂的說是商討護礦方策，但只是「公事」而已。實際上，瀋南十五公里的蘇家屯都成了炮兵陣地，烟台礦在昏迷中早成了共軍的囊中物。

遼東首屈一指的鞍山鋼鐵公司，也隨着滿城的再度棄守，遼陽的失陷，而陷於孤立。這名著中外的鍊鋼廠，在日寇統治時代日產鋼鐵一萬餘噸，接收後，降至一——三千噸的日產量。及至六次攻勢的烽火燃遍東北，鐵路寸斷，遼南煤無來源，電力不足，鍊鋼廠已採停工保管措施，萬餘員工將裁去三千，並打算以成品五千噸作抵押，借款二二四億流通券，以便發遣散費。日來鞍山情勢告急，它勢如壘卵的命運，更岌岌可危。

嚷着胡宗南部將北上應援，甚至於還說胡部將負担打通正太路，收復石家莊的任務。這消息，使在西安的人看了有些莫明其妙。晉南有共軍王震，王庸部約七個旅的兵力，死死地纏着國軍不走。胡軍北上的路途是遙遠的，歷程也是艱險的。希望他來收復石家莊，至少在現階段總有鏡花水月之感。

正如南京西北將領會議時所決定的，陝北防務交由馬鴻逵部接防。西安的消息，馬鴻逵部已抵達延安城郊，準備接防。胡部已大部向晉南集中，準備着開始北上的新任務。就在此時，賀龍又帶了攻榆林的原班人馬的一部份（據說有三個旅）由晉陝邊境向榆林方向集中了。馬鴻逵部子弟兵，蓄精養銳了多少年，他的戰鬥力是強勁的，尤其是他的騎兵。共軍在榆林一戰，頗吃了一點虧。可是他的弱點在於軍隊的政治教育不夠。共軍針對這一弱點，展開了政治宣傳攻勢，企圖分化馬部的戰鬥力。現在共軍對馬部多少有點避戰的打算，而在等機會來一次決定性的戰鬥，來打擊他的銳氣。賀龍的再回陝北，可能是另一次新攻勢的信號。

胡宗南雖然鬱鬱不得志，可是中樞對他的期望並未消減。相反的，在進行中的建軍計劃中，胡宗南部仍為主幹之一部。這一次南京的戡亂建國訓練班，胡宗南部有校級以上的軍官一百二十人參加，訓練完畢後，將赴台灣接受新技術訓練。因為延安之戰以後九個月中，胡部折損頗大，（只清澗一役就垮了一個師）。中樞決定加強胡部的配備，擴充編制。現在主要戰場既不在西北，當局自然不願意讓胡宗南投閒置散。胡宗南本人也認為在西北十年，成績表現不如理想，也想找一機會來表演一番。由晉南山地到河北平原，是英雄的用武地，可是據熟悉胡氏情形者表示，胡部可能他調。胡本人未見得肯離開西北。如西北剿匪總部眞在蘭州成立的話，馬鴻逵，胡宗南或將分任正副總司令，而在西安成立一前進指揮部，由胡來担任指揮官。不過兵已他調，他本人作一個無兵之將，又會有什麼作為呢？

陝北防務交出來了，豫西防務也交出來了，陝北不是不重要，權衡輕重之下，寧肯由生力軍來掌握陝北命運。胡宗南是國軍的一張王牌，傅作義更是一張王牌，今日華北吸引了國軍所有的王牌。傅作義說他不能創造奇蹟，今天，北方人又在希望胡宗南創造奇蹟了。十年來，胡宗南在西北人們心中的評價，暫不置論，但有一樁事實值得提一提，就是誰都不敢說他的好壞。老百姓不敢批評他，新聞記者也不敢提他——不管是說好說壞。他在西安就從來沒有舉行過記者招待會，也從未見他公開發表言論。好壞悶在鼓中。假如到了華北，碰見傅作義這一位有政治家風度注重宣傳的上司，他這一套恐怕也要改弦更張吧！

新、本溪、烟台、鞍山諸礦、廠，空投流通劵成了唯一的活命劑。同時資委會在東北的其他單位，亦莫不在動盪不定的局面下塌了台。如營口造紙廠在共軍五次攻勢之初，就自動解散。日產十五萬噸木造紙的大凌河紙廠於去年十二月十二日被焚燬。楊家杖子鉬礦，錦西煉油廠，水泥廠都遭破壞，瀋陽化工廠、遼寧紙漿廠先後停了工。所以十二月間陪同錢昌照到東北視察各工礦的孫越崎同到北平之後，便悲痛陳詞，力竭聲嘶地疾呼東北工礦的危運。他說：「東北工業已至經濟破產，工程危險的階段。陳總長有心確保東北工礦，但共軍之不要前方的戰法，零星突擊，使若干單位全陷重圍。：：今天所謂拆遷東北工礦，問題已全成過去，人都撤不出來，還能談得到機器。沒有戰線，沒有前方，這種零星的戰鬥，使我們要準備也無從準備起。他們問我什麼是最後階段，我也不知道怎樣對他們說才好，這眞是工業家最艱重的時代。看着工業幼兒，一個繼一個的夭折。」（十二月廿六日天津）裏，我們看出這個工業家的手足無措來了。

資委會自十二月底起始撤退各廠礦的眷屬，之後更陸續撤退各單位的工作人員。當時瀋陽四面楚歌，眼看着資委會的人員個個凌空而去，頗有煩言，然而飛的仍飛走了。在撤退之不暇中，「工業建設」的挖苦話，已沒有那麼不識趣的人再喊了。我們試打開資委會東北各單位的老流水，一年多以來，東北資源究竟開發了多少呢？六大礦於卅五年接收後，卅六年四月份最高產量是四十四萬噸，五次攻勢後各礦的產量銳減，六次攻勢後，全部產量爲十八萬噸，比起日寇壓榨下每月平均二百三十萬噸左右的產量來，其情形之慘，眞不可以道里計。東北經過共軍沒有間歇的攻勢，工礦事業早注定了坍塌的厄運。因爲自五次攻勢後，各礦沒遭共軍攻佔的，如撫順，阜新，鞍山等地，反遭護礦駐軍藉修築防禦工事爲名，強征器材，碉堡沒見築好，許多器材，在市上却都有了行市，銷售上海天津等地。同時小豐滿至撫順長春的輸電線均遭破壞，小豐滿的電却只有往水中輸送。所以瀋陽只有仰賴着撫順發電廠的火電，取得些微的光明，熬過漫漫的冬夜。

作爲中國生命線的東北工礦，兩年來便落得這麼一幅支離破碎的慘象。共軍的長期疲勞攻勢，使得當初興致洋洋的接收大員們，愁眉苦臉的又飛回關裏去了。資委會撤退眷屬員工的飛機是向行總空運大隊包的，據說每人合九十萬流通劵一個坐位。我們眞不知勝利後東北工礦的生產數量，是否能夠負担正常的開支，以及歷次的撤退遣散的費用？現在身負開發東北資源的資委會，已決定僅維持煤，電，機專三項工作了；然而所謂煤礦也不過僅指撫順一處而已。但是這碩果僅存的一處，也早已半死不活的奄奄一息了。

所以號稱煤鐵之鄉的東北，去冬普遍的鬧着煤荒。就以瀋陽一地而論，去撫順烟台、本溪各煤礦，都僅有火車兩小時的路程，然而東北物調會却派員不辭勞苦的到開灤去洽購煤觔，甚至還有「將空運來瀋」的笑話，眞令人啼笑皆非。肚子苦熬過又黑又冷的冬天，今春如何渡過，更使人煞費腦筋。因爲這「穀倉」地區，不但少煤無電，糧食缺乏成了最大威脅。吃了今天沒明天，有了上頓沒下頓，成了普遍的現象。國軍控制下的產糧區，是遼河平原的大部，和松江平原的一部。六次攻勢後這兩塊地區是主要戰場，「搶糧」是共軍六次攻勢的一大目標。國軍看透了共軍的戰術後，也來對搶，老百姓在夾壁牆裏奔命，不但糧食被搶刦一空，就連留的種籽，也都沒有了。就是幸而埋在地裏的，也都躲不過搜查的巨爪。農具則賣的賣，毀的毀，牲畜大部被征，在家裏養不住，賣也沒人要，於是便宰來吃。莊稼人都想開了，年月不忌，今兒不知明天死活，吃了花了是賺的

在共軍圍困大据點的戰術下，瀋陽外圍的村莊，莫不住滿了軍隊。如瀋北五十里的新城子，家家都住着軍隊，眞成了兵農一家？一冬來，高粱米吃光了，吃玉米。小米光了，拿大豆換高粱。老百姓就心明年靑黃不接時，沒法活命，操着南方口音的。有的人也說兩句公道話：「我們知道不該跟老百姓要，可是不要叫我們餓死麼？」距城市愈遠，則情形越慘，新民附近地區的農村，除了老弱看守家園外，壯丁大都逃亡在外，在國共兩軍的鏖戰之後，兩下裏都鳴金收軍，這種地區便成了兩不管的眞空地帶。老百姓們剛要長吁一口氣，然而盜匪如毛，長期的拉鋸戰之後，還要來一次清掃，所以新民到打虎山溝幫子一帶的農村，徒剩四壁，野狗成羣，眞是老弱轉乎溝壑，少壯流落四方，去冬已成了餓殍載道的慘象，今春行將到來的大饑荒，更使人不敢想象了。

政府雖看透了面臨的農村危機，然而在遍地烽火中，救濟農村，是不折不扣的紙上談兵。東北行轅曾呈准要發放百億農貸，這點錢能否眞到了農民手裏已屬疑問，何況還只是乾打雷不下雨呢？所以東北的老百姓已走頭無路了。在鄉間沒法活命逃到城市裏，依然是死路。瀋陽的糧價現在雖居全國的最高峯，然而張風仍熾，目前的苦難只是一個開始，煎熬的日子還在後面呢。

預期的效果，頗有問題。就胡校長而言，他對政府逮捕學生的態度提出三點：一、學生沒有特殊身份，二、學校沒有「治外法權」，三、政府對革命的人，是會逮捕的；打算革命的人，就應當準備被捕。學生們告訴他，被捕同學的罪嫌多難成立，胡校長也親口指出這一點，但他說這是政府佔便宜的地方，因爲它有權力。學生們請他說幾句公

紙老虎，并沒什麼力量。現在，北方學校還沒有聞出武大、浙大、同濟那樣的事件，多少是由於面子關係，有一天，這面子總會要撕破的。」現在，正有許多系會、社團上書胡校長，對他這種態度表示不滿，認爲他有責任替學生說話、奔走。但胡校長是否因此而改變態度，爲同學多跑幾次「衙門」，又是一個問題。

（二月二十日）

（續自「關於工作母機」一文）

燒飯資栄工作的工具了。這許多工具又都是從另一種機器（亦是工具的一種）上做出來，故在我國稱此種機器爲工具機，意即是製造一切工具的機器，含有工具的工具，或機器的機器之意義，亦有人稱之爲工具母機，尙可通用。至如用日本的名稱稱之爲工作機械或工作母機，則在中文字義上頗有不盡善之處。

「Turret Lathe」一物，史文用直譯，陸文用俗稱，二者都不錯，但「六角車床」似乎比較廣用些。

「Speed Lathe」是一種無機械推進設備（如導螺桿進給桿等）及降速齒輪的車床，可譯爲快速車床，木工及輕軟性金屬之車削拋光等工作均用此種車床。絕對不是陸文所稱的多軸車床。

「史文所稱的Brown & Sharpe公司，除銑床平面磨床及小型自動車床外，並不製造如史君所稱的「車床」。

「史君所稱的「一架工作母機可帶幾個馬達」的理想似乎是說得太大了一些。因爲現代或將來最複雜的機件，除鑽小孔而外，多不出四十個加工動作之外。一架工具機內裝了這許多馬達可說是英雄無用武之地，而且亦無如此地位來容納它們。

「Monarch」公司所出稱爲「範型之王Share Master」的車床，除宜於金屬模型花紋及特種形式的車削工作而外，對於一般機件的車削，在成本與時間方面似嫌高了一些。郎史君文中所說的電子能操縱設備，亦並不是每種工具機都用得上的。」

劉中定　二月一日　武昌

北平學生又被捕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北平通信）去年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至「六二」告一段落。此後，學生們再不敢到街頭去呼喊「反內戰，反飢餓」，警備部也明令禁止兩校以上的學生任意集會，這裏的幾個自由學府，校方與學生雖能打成一片，但學校的力量也只能做到「保障校內的自由」。浙大，中大的事件發生後，這裏的學生會發動遊行示威，都受到阻止。同濟「一•二九」血案發生後，這裏的學生更加憤怒，都說「這是當局摧殘學生更進一步的表現。」又動議要遊行示威。正醞釀間，本市又有北大學生宋國柱，清華學生鄭學純、高國慶，輔仁學生范光斗失踪的消息。二月四日北大當局從警備部證實他們都已被捕，時間是二月一日下午，地點是金魚胡同，捕人的是幾個便衣，據說是中統局的。大家正抗議這事件時，又發覺北大學生鄧特失踪。二月六日，北大當局又從警備部證實於二月三日下午被捕。這時又傳華北學院學生孫寶言、徐啓恒也已被捕。究竟他們犯的什麼罪？逮捕機關並未依照提審法公佈罪嫌，更談不到於二十四小時以內移送法院了。但據梁秋水所說，其中宋國柱等五人是民社黨革新份子，梁曾兩度訪李宗仁主任未獲接見，只甘介侯告訴他：「如無共匪嫌疑，就會釋放。」甘的話已說明被捕的原因。

同濟血案已使人不能不有表示，加之本市逮捕案的刺激，在華北學聯領導之下，各校學生於二月七日，也就是舊曆除夕的前兩天，在北大民主廣場開控訴大會，口號是：「反迫害，爭自由。」事先曾有人主張遊行，後因北大賀麟訓導長等力勸乃止。也因賀訓導長強調「校內有集會自由，」這一天，雖在景山東大街有戒備，會場裏也混雜着有嘴邊貼橡皮膠，頭戴灰呢禮帽的特務，但並未發生衝突。這是北平當局較聰明的地方。

會場的情緒很激昂，有活報劇，有詩朗誦，有教授的講演，有二千多學生的宣誓——「誓死反對部頒的自治會組織章程，保衛我們的自治會」。最令人悲憤的，是北大人權保障委員會的報告，據說孟憲功未移送法院以前，曾受好幾次嚴刑拷打，拷問他的某分隊長說：「我們這裏共有刑具七十餘種，打死你正如打死一條臭蟲一樣。」單這兩句，已夠寫盡被捕者的遭遇了。

二月八日，國民黨北平市黨部主委吳鑄人便給這控訴大會戴上了一頂紅帽子，他說：「最近有一部份學生又在為同濟大學醞釀風潮，共匪知其末路已臨，故不惜使用卑劣手段，以求達到搗亂社會秩序，苟延殘喘的目的，蠱惑青年，製造風潮。試對照他們所發傳單的內容，有許多相同之處，吾人可推想這些無聊的行為，都是有互相牽連的關係的。」這原是照例文章，引起注意的倒是警備部的談話，其原文如左：

「北平治安當局前據密報，共匪準備於舊曆春節發動所謂『暴動計劃』，本市各治安機關及大商店均普遍接到共匪署名「中國人民解放軍調查部」之傳單及恐嚇信，治安當局根據此項文件，偵悉潛伏本市之共匪份子，正密謀有所舉動，乃乘其尚未發動之際，予以搜捕，計獲：宋泛、范光斗、宋國柱、顏垂明、高國慶、徐啓恒、鄭長風、孫寶言、鄧特等九名，均為共匪文化及學運方面負責人，其中（一）宋泛（化名唐吉、董永祥、黎簡）為朝華書店職員，供認加入共黨為匪作文化宣傳工作，（二）范光斗為輔仁大學學生，華北學聯代表，共黨外圍團體社會主義青年聯盟發起人，參加匪黨鼓動學潮，（三）宋國柱，北大學生，青年聯盟發起人，（四）高國慶，清華學生，青年聯盟發起人，（五）徐啓恒，華北學院學生，青年聯盟發起人，（六）鄭長風，無業，青年聯盟發起人。以上四人與范光斗同在祕密開會時被捕，（七）孫寶言，華北學院學生，為華院匪方份子之領導，（八）鄧特，曾在二〇八師入伍，現在北大讀書，係復員軍人，受華北學聯領導為共匪宣傳。各犯就逮時，曾搜獲共黨宣傳品，「辛亥革命三十六周年紀念」，「人民解放宣言」，「零下四十度」，「飢餓」等甚多。」

這些罪嫌，北大胡適校長，賀麟訓導長都認為難於成立，特別是鄧特的罪嫌，各學生社團都指出是一種莫須有的罪名，「如果『受華北學聯領導』就可以被捕，那麼華北的大中學生，誰都可以被捕。」胡適校長曾對學生代表說：「你們可請法律顧問控告警備部發言人，叫他拿出證據來，證明：一、華北學聯是共黨機關，二、鄧特是受這個『共匪』的華北學聯領導為『共匪』宣傳。」不過，警備部是不管這一切的，陳繼承總司令說：「我要偵訊。」偵訊的結果，宋國柱、鄭學純、高國慶、范光斗、徐啓恒等五人於九日晚移送法院，鄧特等四人却留在警備部，原因是有軍人身份。鄧特的軍人身份，乃因他曾於三十三年參加青年軍。這說法也沒有道理，胡適校長等都明白指出；復員後的軍人沒有軍人身份。後經校方交涉，陳繼承乃改變口吻說：「我當儘量把他當學生看待。」

鄧特的罪嫌既難成立，又無軍人身份，又不移送法院，便只有釋放一途了。但這是警備部所不許的。而鄧在被捕前本有病，如果再在獄中拖，性命堪虞，故北大自治會頻頻要求校方設法保釋，賀麟訓導長便迭連跑警備部講人情，但因在舊曆年節，常常找不着人，到十七日，才由校方備正式公函連同醫院證明書將鄧特暫時保出，交市立醫院診療。保釋時，警備部鄭重聲明：這只是暫時性質，鄧特病稍好轉或無嚴重性時，仍要交回繼續偵訊。北大各社團則認為：既經十餘天的偵訊沒有結果，且「受華北學聯領導為共匪宣傳」是一種莫須有的罪名，根本沒有再偵訊之必要，并進而要校方向警備部提出「負責醫藥費」等條件。而鄧本人是否再受得起偵訊，也大可慮。據探訪鄧特的人說：鄧於二月三日在銀閘東口（北大三院來紅樓必經之處）被捕，被捕時因有人圍看，特務便聲稱是捉小偷，邊拖邊打，帶至警察某分局，再轉至警備部。在警備部，曾灌涼水兩次，上老虎櫈數次，挨槍托打則是常事。晚上沒有被，白天只發幾個冷窩頭。鄧原有病，受這種苦刑後，病徵加深，現在面色蒼白、口乾、咳嗽、吐痰、頭痛、鼻子不通，小便次數甚多，手和嘴唇常發抖。他的罪名的根據，是因不該在學校辦「奔流」壁報，這壁報被認為「過激」，一定有人在背後主使。」

鄧特是如此，已移送法院的幾個呢？北大當局已答允聘請辯護律師，但法院慣會拖，孟憲功案即是一例，而且審判權屬於行將成立的「特種法庭」，軍法官也參加審判。學生們不能不着急了，他們常常提到于子三事件和浙大寃獄案，他們害怕同樣的事件會重演在北平；而這，誰又能担保？因此，這幾天，北大的同學又緊張起來，他們呼喊：「救人如救火，胡校長應該拿出力量來。」「『奔流』是經訓導處登記過的合法壁報，訓導處應站出來維持自己的尊嚴。」「三院來紅樓的途中可以捕人，校內的安全在那裏？」

（下接十八頁第六欄）

世界之兩極化

（遊美雜記之一）

何永佶

世界之兩極化

「滕小國也，介乎齊楚二大之間，事齊乎？事楚乎？」—幾千年前，滕文公以這個難題來問孟子。幾千年後，這個問題仍然存在。目前世界已兩極化到一齊一楚，介乎此二大之間則是中國。我國雖號稱地大物博，然在國力上却等於一小「滕」，「兩大之間難爲小」—這是中國今日之苦悶。任何解決這「事齊？事楚？」的辦法，必先基於對齊楚之親眼認識，這種認識常不易於書本報章處求得，勢須抓住機會去求個耳濡目染。

在東北時已經聽說蘇聯軍官因聽見係美國烟而不肯吃，且說：「我只抽蘇聯烟與中國烟」。又聞蘇聯軍官因知道某中國人會講英文而不肯與之談話；且說：他只願說俄文或中文。在上海電車上，有一天，一個氣憤憤的英國人，因電車賣票員不懂他的英語，而大聲咆哮的說道：「在有租界的時候，誰也講英文，誰也懂我的英文！」旁邊有一個似俄國人的漢子乃用英文說道：「不錯，在已往，誰也講英文，誰也懂英文；但從此以後，誰也應講俄文，誰也應懂中文了！」。

我雖懂點英文，但毫不懂俄文，在認識齊楚之步驟上，只有先齊而後楚，等到學會一點楚國話後，然後以同樣的身份（平民）、同樣的虛心、同樣的求知慾望，去遊楚國。齊楚二國都是近代的「地緣國家，」各把上帝所造的地球上的一塊面積劃出而昭告世界曰：「這是我的，」這塊面積的一出一入，都要靠同生命一樣重要的「護照」。護照這個東西，是近代國家統治術中一件厲害的武器，其起源不可得而考，聽說是從俄國學得來的；俄國在沙皇的時候，已經有嚴密的護照制度，但其普及全球是在第一次歐戰中及其以後。第一次歐戰前，護照制度尚未普遍化，國際旅行仍甚自由。有時我疑心孫中山革命之所以成功，得力於那時尚未有普及的護照制度之一事實者不少。因爲那時不需護照，所以孫中山才能在每次失敗後溜往海外。假如他生於今日，恐怕沒有那麼容易了，他捲土重來的可能恐也少得多了。

護照與簽證

盡人都知道現在領護照之難，而不知爲護照找個簽證（Visa）也不容易。在我找美國領事館簽證的時候，見到一個學生，三年前他就告我說要去美國。當我問他是否已經同來，他說還未去咧，理由是沒找到簽證！除了外交護照由美國駐南京大使館簽證外，其他護照均須由美國領事館簽證。在上海美國領事簽證辦公室內，掛着一張以鏡框鑲好的漫畫家 Schiff 的一張曾在上海大美晚報登過的諷刺畫。其中描寫求簽證者的偈促不安姿態與領事官員的神氣十足，畫出一帶着眼鏡的女祕書高高站在辦公棹後而求簽證者則蜉立在辦公棹前，縮小到矮人一樣，而加以按語曰：「當權威的聲音發出，你將會縮小到如此」（It makes y u feel like that when the voice of authority speaks）！

其所以令人覺到如此，是簽證的手續。第一你要講出要去美國的目的。如你所說的是關於文化，則他們叫你去找美國新聞處，說出你要赴美的理由。新聞處當然要你提供證據，如新聞處認爲證據的確，便通知領事館，領事館的簽證處便又問你第二問題！那便是你有多少美金，可以住美國多久。普通學生至少要有一千五百元美金，且必要匯票或旅行支票，因爲那時現鈔不准攜帶出口。除了這幾樣外，其他所要的是你的英文程度如何，你的在美計畫等等。簽證員對於這些都滿意後，則你必須去找領事館內之美國醫生去檢驗身體，因爲美國移民局說中國醫生的檢驗靠不住。美國醫生所驗的是從你的頭到你的脚，特別注意你的肺部與眼睛。你又須另請醫生來驗你的大便，看有無蟲子蟲卵。

好容易經過這些檢驗後，則你須在一女簽證員面前，舉起手宣誓，說你所填的表，所供的話，都是千眞萬確，無一漏洞，然後她才蓋一個簽證的印，並在其上簽字。

海船

她的簽字是條鑰匙，可以把美國的大門打開讓你進去。有了那個，你便可以去定飛機票買船位。飛機只要三天就可以到（星期一下午由上海起飛，當晚到關島（Guam）星期二晚到檀香山，星期三晚到舊金山）但無甚可看。如無緊急事，還是坐海船上算。

這海船不是戰前的郵船，而是戰時兵船暫由航海公司由美國政府手裏租過來作國際交通的。有許多連船上人員都來不及更換，所以在船上做工的，多帶着上校上尉少尉一類的稱號。既然是兵船，所以沒有戰前那樣舒服的床鋪、華貴的餐室、漂亮的寫字間等等。寢室則幾張床位甚至幾十張床位（多數是一上一下的洛克床）在同一間臥室內，洗澡房及便所狹小，生意最爲興隆。餐室內則是幾張長櫈，都釘牢在甲板上，別無旁的花樣。每日用餐則日有三餐，入夜如肚餓尙可叫侍者拿出點每日所剩下的鷄魚豬鴨以充飢，橫豎這些東西在晚上都要拋落大海。據船上人言，每天扔掉的食物可以供四五百人之食。問他爲甚麼如此的暴殄天物，他說沒有別的辦法。船上進餐都用菜單，菜單上之每樣必須做個有餘，庶船客叫起菜來，樣樣都有，如此則每餐必剩下許多東西，這些剩下的，不能再用，再用則船客必說船公司開舊飯，影響公司名譽及其以後的生意，故寧可多炒多煎，剩下的留以喂海上的魚蝦！

船上沒有甚麼娛樂。有時演些舊片電影，無甚精采。艙面上有一棋室，船客多在那裏打「不利己」（Bridge）入夜則有所謂 Bingo 遊戲，玩者不拘數目。每人面前擺着一張硬紙，上有BINGO五字母，每字母下有數目學如1,2,3,4,之類。玩衆中有人搖數目字，搖出時則一一唱出，先能成BINGO一行者勝。

日本之一瞥

日本現在美國軍事統治時期，禁外人入境，使日本國內糧食問題不至於因有外來人入境而更形嚴重。惟遊客欲在日本停留幾個鐘頭而乘原船他往者，則可請其國駐東京之代表團向美軍總部取得一准許書而下船作走馬看花之一瞥。

我就是這樣取得四個鐘頭的呼吸日本空氣。代表團的朋友們的盛意甚爲可感，派了一輛汽車來並派副官來替我交涉下船，這也費了一兩個鐘頭。在船上已望見在碼頭上日本人的襤褸。船上人有人擲擲小錢及香烟下去，起先也有一羣的日本小孩在搶，後來一個日本老頭出來呵止，便沒有小孩去搶，也便沒有人拋擲了。汽車由橫濱直駛東京，需時不過四十五分鐘，沿途我盡力去找轟炸的地方看看，但已不大看得出來，燒去的地方不是已長了綠草就已搭起木板屋。有些地方還種了青菜。二十年前所看見的工廠林立的橫濱，在今日幾與南京相彷彿，城市中帶點鄉村風味。據代表團朋友說，美國在日本之佔領費用，每日要一百萬美元，故美國不能不扶起日本工業使其靠近自給自足，以便減少佔領費。

東京的人口稠密，似乎並未減少，二十年前的熙熙攘攘

關於「日本復興會不會威脅中國」？（通訊）

費孝通

安平兄：劉子健先生在觀察三卷二十四期發表了一篇「日本復興會不會威脅中國？中國應該怎樣應付復興的日本？」我讀了之後認爲有幾點：值得提出來商榷：

一、劉先生說：「因爲認識不足，所以勝利以後，先以爲日本從此完了，大可高枕無憂，後來又聽說經美國扶植，日本的復興進展很快，又忽然大吃一驚，彷彿日本卽將捲土重來。這兩極端的看法，都是幼稚的錯誤的。」這種論斷未免低估了國內對「日本復興」討論的性質。劉先生要我們認識日本是對的，但是縱觀劉先生這一篇文章，並沒有對於戰後日本社會改變加以分析，祇說了一句：「佔領的施策也沒有動搖了它的社會組織」，因而說日本復興前途是「光明」的。國內論者的「大吃一驚」就發生在這一個事實上。因爲如果日本的社會組織沒有動搖，日本的復興就可以認爲和平的威脅；侵略並不是歷史上的偶然事件，而是由社會背境中發生的。除非劉先生認爲日本戰敗前的侵略和日本社會組織沒有因果關係，決不致很快的結論說社會組織沒有動搖的日本復興之後不致威脅中國。

其實劉先生並沒有說日本不能威脅中國，而祇是說「美國決不希望用日本再去侵略中國的！太平洋在美國海軍手中，日本人爲能飛渡？」於是我們應當討論到。

二、美國是否係日本不再侵略中國的保證。劉先生所給侵略的定義，看去是狹義的，那就是出兵占領的意思。假定日本永遠逃不出美國的掌握（這假定並非必然的事實），日本軍隊再來大陸上攻城占地，固然必須得到美國的允許，但劉先生所謂「美國決不希望用日本再去侵略中國的」一個結論，需要兩個可能的前提，一是美國不會在東亞作戰，一是如果作戰，中國一定站在美國一方面的。第一個可能的前題並非劉先生的意思，因爲他承認第三次大戰有可能性。他於是想象當戰爭發生時，日本人不過做勤務，「決不會再武裝日本」，「更不會讓日本對中國有任何軍事性的威脅」。這種說法，我實在不能瞭解劉先生所謂軍事性的威脅是指什麼了。所以不如說中國和美國決不會發生戰事爲可能自圓一些。事實上，我不知道劉先生憑什麼可以保證一個獨立的中國有必須參加美國一方作戰的理由。如果讓我再推一步，不如說：中國已經和日本一般在美國掌握之中了，所以小夥計們是不會打架的。劉先生確這樣想，所以「美蘇對立的尖銳化已不是任何他國所能左右。中國惟想在兩大之間，有所周旋，但就全局而論，凡在『鐵壁』之外的，對蘇方針大體上都不得不以美國爲馬首是瞻」。

劉先生這種看法似乎太現實了，現實到了把中國看成和日本一般，那是我不能同意的。在還沒有被占領之前，自已就解除自已的獨立外交，卽使是最沒有出息的國家也不至、也不應、如此。

三、劉先生對經濟侵略的可能一筆勾銷，說是以往「中國工業還是慢慢在生長」，「卽使日本貨，因爲美國投資的關係，而作爲美國貨，也不是與其他美國一樣嗎？如果價錢低廉，有傾銷的企圖，我們儘可提高關稅。」在這裏劉先生卻不再是現實主義了。中美商約在事實上是否已給優勢的美貨開了方便之門，日本貨以美貨名義在這門裏進來，我們擋得住麼？我再接着讀下去說：「只怕工業來不及發展，實在用不着担心日貨。」又好像「這時候我們難道不買日貨，偏要去買英國布嗎？日本進貨，也決不能壟斷市場。」我實在不知道應當怎樣說了。我很怕劉先生太低估了國內言論界的程度，竟在幾個截釘斷鐵的「決不」之下，把問題看得，卽使我們不願用「幼稚」或「錯誤」兩字，也不免太簡單了。

當然，我無法否認，「何必自責寬而責人則苛呢？」這話說在「以巨大的中國，而怕小小的日本」之後，我眞覺得有些面紅，劉先生竟這樣健忘，這小小的日本幾年之前曾佔領過我巨大的中國的，是否我們連這一件事也因爲大小不能相提並論而加以引咎呢？

恕我寫到這裏不免已有了一點意氣，但是不能不在提出我和劉先生看法不同的地方之後，說出我私人的感想，劉先生這種看法是不健全的。我同意劉先生我們大家要力求認識日本，但是在認識的過程中最好要保持事實的分析，似乎不應在充分瞭解之前，把許多重要的問題，用獨斷的「決不」兩字加以勾銷。

弟費孝通二月十八日

擴，至今猶在。但日本婦女的服裝已多由長袖袍子改爲長褲短衫木屐，走起來活像鴨子。

同盟國中沒有軍隊駐紮日本的只有蘇聯與中國。蘇聯是不願派，中國是派不出來。派兵駐日的頭一件困難是自己要帶糧食，因總部有命令不許外國人在日本購買糧食，所以甚麼吃的都要自己帶。中國缺乏運輸工具，自己不能帶多少，而且國內內戰正打得兇，又派不出甚麼像個樣的軍隊來。近日聽說盟軍總部只許中國派四十名憲警以保護代表團，是則已由派不出來而降爲不許派了，嗚呼！

我本欲與些日本領袖談談中日問題，且有幾封介紹信。因須趁原船赴美而未果。我想日本當亦有不少人爲這問題而焦急。從我們的觀點來說：我們不是不願中日合作，奈日本人蠻不講理，甚麼都要他佔便宜，要合作也合作不來。但從日本人的觀點來說：日本人不是不願中日合作，奈中國亂七八糟，永找不着可代表中國的一個穩定交涉對象。去找中央則中央推往地方，去找地方則地方推往中央。國人推諉責任的慣技，使得中日不能合作。如是一鷸一蚌，各不相下而至相爭，坐使白種人收漁人之利。這是辦法嗎？

經過這次中日戰爭後，我想應該有思想前進的日本人覺悟到：如中日兩民族老在那裏這麼搞，則大家都不能做正經事，把大好的時光花費在無意識的小骨頭上。其實在這戰爭前已經有日本人如此想，所以他們幫助孫中山革命，頗有扶起一個日本能在中國以之爲交涉對象之意，故一九二七年發生之南京事件，英美砲艦開砲而日本砲艦當時也停在下關卻沒有開砲。國民黨本是與日本有好感的政黨，孫中山北上時尚取道日本向他們演說，何以後來中日外交在國民黨執政下愈弄愈糟，弄到要拼個你死我活？這是我們深爲詫異的。

國幣二百萬元

徵求觀察叢書封面設計

三月十五日截止

觀察叢書的封面，我們已請人設計，但爲精益求精起見，茲再公開徵求。觀察叢書的開數是三十二開，我們希望封面設計要莊重、樸素、典雅。我們傾向四週用框，而框的花紋必須十分典雅。三月十五日徵求截止，採用者奉酬國幣二百萬元。但沒有經驗的讀者，請勿嘗試，以免浪費彼此的精力。應徵者請附退件郵資二萬元。

書評

國民所得

陳振漢

(Income—An Introduction to Economics)

皮古 (A.C. Pigou) 著

倫頓麥克密侖出版。一九四六年六月初版十月重印。定價五先令。

皮古教授是現尚健在的英國最著名的經濟學者之一。本書是他在退休以後所寫的幾種小册中的一種，原是他一度對劍橋工科學生講授經濟學時的七篇講稿。因爲是幫助初學或外行入門之作，同時又是拿來講讀的講稿，所以全書內容大體淺顯，文字也頗質樸。

然而這本小書並非通常的經濟學入門書籍；如果所謂「入門」書的用意只是爲使初學瞭解某一學科的傳統的或現存的內容。作者在本書裏面所講到的雖然泰半已成目前經濟學中的定論，却是在習用的經濟學原理教本中所不輕易涉及的。普通的原理教本往往一開頭即是「需求與供給原理」(Law of Demand and Supply)，本書則企圖一矯此風，另闢蹊徑，所以雖然亦名「入門」，却並不以專章來敍述邊際效用或等好曲線(indifference curves)，需求與供給函數等觀念。作者在七篇講義中所講的完全是有關國民所得的問題：一國貧富程度的測量，影響貧富的因素以及各個人間的所得分配（第一章：國民所得的定義及其量度；第二第三章：影響一國富力的國內因素與國際因素；第四章：各種用途間生產因素的分派原則；第五章：政府與生產活動；第六章：商業循環與失業對國民所得的影響；第七章：所得的社會分配）。作者認爲這些問題旣對初學比較親切易懂，也能匯納近代經濟學中的大部問題以作融會貫通的討論。（見原書「尾語」，頁一一八）所以此書篇幅雖小，實與黑克斯的「社會脈絡——經濟學入門」(J.R. Hicks: The Social Framework: An Introduction to Economics, 1942）一書同樣代表經濟學教學法上的一種革新運動。黑克斯一書與皮古的「淺說」體例類似，只是程度較深；自一九四二年梓行以來，獲得了各方贊譽，轉瞬之間再版多次，一九四五年又以美國版問世。所以皮古此書在這種意義上其實只是一個黑克斯的簡編或普及版。當然我們絕不是說這是一種投機的生意經。劍橋經濟學傳統，尤其是皮古教授本人，向來把國民所得水準的提高與經濟福利的增進認作經濟學的主要任務，在凱恩斯的就業理論中國民所得也是重要的一環，加以在戰時與戰後財政經濟政策中的廣泛應用，關於國民所得的各種問題，自然成爲廣大讀者渴欲瞭解的對象。本書之以所得觀念作爲經濟學的初學津梁，實非偶然。

以上我們說明了本書的性質內容以及作者著述此書的主旨。從這裏也可以看出這樣的著述，雖然篇幅簡短，內容淺顯，却並不易於着筆。一個作者要把這樣的書寫得討好，除了對於某一學科的成熟修養以外，且須有豐富的教學經驗與教育熱忱。寫這一類的書，皮古教授可說已是很難得的人選，我們也當承認本書在大體上不失爲對於經濟學入門教材的一種可貴貢獻，雖然尚有若干可以改進的地方。

書中所可訾議的地方，主要在於敍述與說明的方法與步驟上。這裏面我們認爲主要有兩方面的問題：其一，也是比較基本的，是即令以國民所得觀念爲啓蒙課題，要使初學充份瞭解其中內容，能否完全避免供需觀念的討論？供需觀念恐怕是討論任何經濟問題所不可或缺的工具。皮古教授在本書中雖未對之特加申說，自也屢次用到。譬如在第四章中關於生產資源如何在各種不同用度間的分派的討論，即完全是供需分析（原書頁五六—七〇）。「供」「需」觀念的本身誠卑之不高，不必特別申說，初學讀者也當懂得。不過籠統的「供」「需」觀念對於普通讀者常會發生困惑或疑難。譬如我們常說物價係由供需決定，但在市場上「供」「需」又明明隨物價增減，這是否顯然矛盾呢？所以爲裨益初學，即使是簡單經濟問題的討論，往往需要比較嚴格的供需觀念。皮古教授在書中討論影響所得水準的國際因素（第三章）時，也忽然放棄籠統的「需求」，不加述說的應用「需求表」(demand schedule)（原書頁四八）的名辭。這一名辭的意義，如不加說明，或非劍橋的工科學生或其他初學者所能完全明白。這表示即使以國民所得爲初學門徑，對於供需觀念，仍應在書中的適當處所予以較詳密而淺顯的說明。

書中另一方面的缺憾主要是篇幅的短少所引起的。本書只是百餘頁的袖珍小本，却談到了近代經濟學內容的極大部份。作者因此竭力使文字簡潔，簡潔到不易使一般讀者明白，特別是初學的讀者。除了當講演時所能解釋清楚的以外，皮古教授在全書中本來竭力避免着應用專門名辭；但偶爾仍有少數名辭，大概也是爲行文簡潔，不加說明，因而不免困惑初學的，諸如「適度大小」(optimum size of firm 頁三〇)，不完全競爭(imperfect competition)，獨佔(monopoly, 頁三一)及「比較價值」(comparative values, 頁三九)等。然更足使普通讀者費解的，或者還是有不少過於簡略過於突兀的結論。例如作者在說明市場競爭情形與生產單位大小的關係時有這樣一段話：「如有不完全競爭的情形，生產單位往往過多，每一單位往往過小。零售商店每有這類情形。更顯然的，如有機會造成有力的獨佔，使公衆付較高的價格，一個生產單位或商店往往擴充過度。即是說，如果規模稍小，它的平均成本反可減低。其所以有這種情形是因爲這一生產者在擴大規模，壟斷市場之後，其所得可補償平均成本增加的損失而有餘。」（原書頁三一）一個讀者讀到這樣的結論，在經過思索以後或者能夠領悟；但當皮古教授在劍橋的工程教室中講到這段話時，多數聽講的學生或者不免茫然。所以本書雖爲初學而作，初學讀之恐不免疑難叢生。爲使之成爲完善的入門教材，尚有不少可以補充改進的餘地。

至於專門的讀者，自會相反的感覺其中許多敍述近於嚕嗦，對於其中說法也未必完全同意，但從本書中也可窺見皮古教授對於經濟學的整個看法以及福利經濟學(Welfare economics)的神髓。

（續自二十三面）

面，成本就要六千元了。但是爲了信用，預約價旣然定出，自然不好改動，所以在三月十日以前預約者，仍祇得照上次所定的價格。第一批七册，除張東蓀先生的一册「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因爲張先生課忙體弱，每天的著作工作，不能過重，不克早日脫稿外，其餘六册，大約在五月底以前，可以出完。現在「政學罪言」、「鄉土中國」、「英人、法人、中國人」三書均已付排。

上海讀者注意

我們爲便利上海西區的讀者起見，已委託膠州路一八六號西風社代訂本刊，爲便利上海中區的讀者起見，已委託河南中路八十二號世界知識社代訂本刊。上海虹口區的讀者願意訂閱「西風」及「世界知識」者，本社亦可代訂

編者報告

休刊期間，定戶增加了一千六百多名

讀者先生：我們休刊了兩個星期，從本星期起，第四卷又開始了。刊物雖然停了兩週，但我們的工作並未停止。在休刊的兩個星期中，由於許多讀者先生的愛護和熱心，接受我們的呼籲，替我們介紹新的定戶，使我們的直接定戶在短短的半個多月中，竟然增加了一千六百多名。我們在三卷報告書中所宣佈的定單號碼，還祇到14414號，截至今日（二月二十四日）止，我們定單號碼已升至16032了；在月底以前，可能還有更多的遠地的定戶函件湧到。我們對於一切幫助我們的讀者先生，在此表示最誠懇的謝意，你們的熱心幫忙，支持愛護，都足以增加我們努力的勇氣，使我們在心靈上獲得一種極大的鼓勵。

關於定單收據的處理，我們曾感到小小的爲難。在平時，每一個定戶來訂閱，我們就將定單收據夾在刊物中寄給定戶，使定戶很快就能收到定單收據和刊物。可是四卷一期要到二月二十八日出版。如將定單收據擱到二月二十八日再寄（卽夾在四卷一期內寄去），則在二月十日或二十日以前來訂閱的定戶，勢必無法早日收到回信，因而引起焦慮，甚或懷疑我們辦事不負責任。但如每一個定單收據，都要一一隨時寄出，則在我們實在是一重可觀的負担。因爲單單寄這一頁定單收據，一個信封要一千數百元，平寄（作印刷品）郵費要一千元，航寄要四千元，譬如一個匯來十五萬元的航寄定戶，我們若寄他一頁定單收據，便要化費六千數百元，幾乎佔到收入的百分之五，這個支出未免太重了。但是我們考慮結果，甯願我們多損失這六千數百元，不願讓讀者心中焦念。因爲我們一貫的精神是希望獲得讀者的信任。祇是二月二十三日以後收到的定戶來函，我們便不再將定單收據單獨寄出，都擱到二月二十七日寄四卷一期時，夾在刊物中一同寄上，因爲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爲期不過五天，這一部分的定戶讀者，卽使等候回信，也不致等得太久，而在我們方面可以多少節省一部分郵費的支出。我們希望我們這種處理可以得到定戶先生的諒解和欣賞。

航空郵費增加，決由我們墊貼

不過在這一個過程中，對於航空定戶，卻發生了一個意外的麻煩。原來在三卷二十四期付印時，航空郵費還沒有漲，所以我們規定，航平三個月是十五萬元，六個月是三十萬元，航掛三個月是十九萬元，六個月是三十八萬元。但就在三卷二十四期出版的一天，航空郵費漲了百分之五十，本來航寄一份是四千一百二十元的（四千元是航資，一百二十元是郵資），現在卻變了要六千一百二十元，所以每一份航空寄費要增加二千元。我們對於這個問題，也是非常爲難。不要定戶補吧，則本刊墊貼太重，要定戶補吧，定戶必定感到麻煩，甚且會怪我們辦事不週到，怎樣剛剛寄了錢去，又要補了？其實我們事前並不知道航資又要加價。我們千考慮，萬考慮，考慮結果，決定仍由我們忍痛墊貼，因爲這次所增加的新定戶，都是承許多熱心讀者介紹的，假如要每個航空定戶補交郵費，那定戶必感麻煩，如其扣發刊物，定戶也不會痛快，所以還是由我們來担負這筆損失。但是我們願意把這事的經過，說明如上。

寄還的舊信袋，這次都利用了

我們曾經在三卷十七期上籲請定戶將我們寄刊所用的信袋寄還我們，以便我們再用，既可減輕我們的負担，也可節省物力的浪費。這個呼籲發表後，許多熱心的定戶讀者紛紛響應，我們前後一共收到三千個左右。這一期所用的信袋，十分之六都是舊信袋，也就是許多定戶讀者所寄還的。這一件事，在經濟上的價值雖然有限，但在道德上的意義很大。我們中心欣慰：我們與讀者之間確確實實建築了一種精神上的聯繫。編者與散佈於全國的讀者，雖無晤面的機會，但是我們在心靈上顯然心息相同，共同合作，在這個艱困的年頭，協力維護着這個刊物。

廈門鼓浪嶼的一位林先生，曾兩次來函，指示我們印信袋的最合算的方法，他並自願爲我們義務服務（他信中說得很具體，而且是很實在的）。不過我們因爲已將第四卷全卷所用的信袋紙買好了，所以未能請其幫忙，但是我們對於他的盛意是同樣感激的。我們的信袋，過去是用的西洋牛皮紙，這次因爲成本實在太貴了，所以改用了中國牛皮紙，合起來，大約每個信袋化到九百五十元左右。同時我們決計採用三卷二十期所載香港讀者梁子奇先生的建議，改爲三摺，藉以減省紙張的面積。因之，我們也可以順便在這兒向讀者報告，我們無時不在考慮讀者的一切良好的建議。我們希望讀者先生對於本刊有任何建議，均請隨時賜教，我們必定虛心接受，祇要事實可能，遵照實行。

售價又加了

我們在三卷二十四期的封底上說，自第四卷起，本刊售價可能增加，讀者如欲避免漲價，卽請趕快定閱。我們本不希望加價，但看到物價在陰曆年關之後，可能波動，所以預先勸告讀者：從速定閱。現在不幸言中，從這一期起，本刊每期竟要增售至一萬五千元了。因之，對於在四卷一期出版以前來函訂閱的新定戶，我們似乎也有一種安慰，卽我們並沒有以「加價在卽」作爲一種虛言，藉以招攬定戶，現在的的確確是加了價，也可說至少我們已在事前對於讀者盡了一次友誼的關照。現在排印工加了百分之六十左右，五號字排工已漲至千字二十萬元了，而紙價正在扶搖直上，已到每令二百九十萬之數。照這樣漲上去，我們眞不知到四卷二十四期時，要售幾萬元一册？成本一天一天增加，再加上郵資的時時調整，刊物業務前途，令人焦慮不止。我們已在心理上準備接受一個事實：本刊的發行數可能下降。說起來這是很悽涼的，但也是沒有辦法的。

規定了退稿的郵資

關於退稿問題，我們一再請求惠稿諸君附足退件郵資，藉以減輕我們的負担。但許多投稿先生不肯賜辦。最近我們收到的投稿，十篇中倒有九篇不附退郵的。在這種情形下，我們怎樣辦呢？一一照退吧，這筆郵資和信封的負担也不算小，不退吧，在良心上總感不安。在三卷結束後，我們整理積件時，還有八十幾件稿子，因無退郵，尙未退出，結果我們還是一一照退了。可是在中國，有時想做好人，反而不得好果。可能有些收到退稿的先生，心中還要引起憤怒：爲什麼把我的稿子壓了這久，到現在才退回來？（壓下未退是因爲沒有附退件郵資），我們決定，做好人索性做到底，還另外一一附了信去，說明我們爲了顧全作者心血，所以雖無退郵，我們終於還是貼上郵票退上了。我們爲解決這個問題，減少我們良心上的不安，考慮結果，決定將退稿所費的郵資，闢列數目，每期都刊載在封面上，這樣，假如惠稿諸君還不體諒，我們也就祇好嚴格執行：不附退郵的稿件，不再退還。

關於叢書的預約

關於叢書的預約，我們決計延至三月底截止，三月十日前預約者，是一種價格，三月底以前預約者，又是一種價格。我們究竟是書生，所以關於成本的計算，不夠精明，上次在三卷二十四期上宣佈的各書預約價格，卽使初版悉數售完，還有賠本的危險。因爲那時的估價，還是照紙價二百萬一令的標準算的，現在想不到一跳跳到二百九十萬一令，而紙價的上漲，還不知漲到什麼程度。譬如我們最近買進的叢書封面紙，是最好的木造紙，恐怕所有上海的出版的書籍，都沒有用那樣好的封面紙，單單每一本叢書的封

（下接二十二面）

觀察叢書·開始預約

本社自今春起，除每週發行觀察週刊外，另再出版觀察叢書，就思想與知識各方面，作系統之介紹，以補週刊之不足。觀察叢書在風格上，和觀察週刊近似，一面保持相當學術水準，一面深入淺出，以期通俗。內容不拘一格，總以充實爲主。封面設計典雅，印刷力求精美。現已開始付排，自四月初起即可絡續出書。茲先露佈七册，餘容隨時公告。物價波動劇烈，售價倘難確定，茲爲優待讀著起見，謹先發行預約，如承早日惠訂，不勝歡迎之至。

觀察叢書 1　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　張東蓀著

「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一書係張東蓀先生專應本社之請而寫。本書從兩方面分述：一卽理論方面，一卽歷史方面。目的完全在分析其中所有各問題何以會發生。張先生始終相信：「民主主義如要徹底，終會形成社會主義」。讀者讀畢本書後，自可尋出中國的出路。

本書暫停預約（張東蓀先生因課忙體弱，每日著作工作，不能過重。本書須至六月始能脫稿，七月後始能出書，故暫時停止預約。已預約者有效。）

觀察叢書 2　政學罪言　潘光旦著

本書收集潘光旦先生最近十年來所發表的論文。上篇爲思想部分，中篇爲教育部分，下篇爲政治部分。著者認爲社會上多少紛爭，都起因于各人看法的不同與呆板。不同不要緊，呆板抑是一個纖綸；纖綸不除，自然紛爭不已。看法有寬有窄，有畸有整，其背景裏，經驗與事實的成份，主觀與情操的分量，以及認眞與固執的程度，往往大有不齊。如果我們以力求客觀與祛除我執，責成自己，則看法自能比較寬整，而其不同之所在，不特不妨礙問題的商討解決，抑且有助於生活的合作和一。全書經著者詳爲校訂，增補註解，凡十七萬字。在今日中國爭取民主自由的時代，還是一册最必要的政治教育讀物。

三月十日前預約：八萬元
三月底以前預約：十萬元
郵費預收：掛號八千元
（多退少補）航掛：四萬元
出書：四月

觀察叢書 3　唯物史觀精解　吳恩裕著

本書對唯物史觀的理論，作全盤的闡釋。行文力求通俗，少所徵引，但解釋則務期正確與深刻。首先說明唯物史觀的基本涵義，然後再分別闡述：（一）以唯物史觀解釋社會的構成及其發展，其中包括對政治、法律、道德、宗教等分析；（二）以唯物史觀解釋個人的思想、人生觀、及其社會活動等。本書著者從拉斯基教授治學多年，對於馬克思學說有獨到研究。本書係應本社之請而寫

三月十日前預約：三萬八千元
三月底以前預約：五萬元
郵費預收：掛號七千元
（多退少補）航掛二萬五千元
出書：五月

觀察叢書 4　鄉土中國　費孝通著

從基層上看去，中國是鄉土性的。中國正在從這鄉土性的文化向着現代化的方向蛻變。每個人都在遭過這蛻變過程的磨難，這也許是不易避免的。但是如果要想滅輕一點代價，祇有從瞭解我們背負着的傳統入手，去計劃我們蛻變的合理過程。本書是一個對鄉土性的中國社會的分析。著者用社會學的方法，說明我們鄉土社會基層的結構，這些我們大家感覺到而說不出的生活方式。這是一種自覺。從自覺裏才看得到我們的出路。全書包括十四篇論文，另長序一篇

三月十日前預約：三萬八千元
三月底以前預約：五萬元
郵費預收：掛號七千元
（多退少補）航掛二萬五千元
出書：四月

觀察叢書 5　中國文化與現代化問題　吳世昌著

本書收集吳世昌先生年來所寫的十幾篇有關中國文化與現代化問題的論文，論思想的復員問題，中國的青年運動問題，文化與現代化問題，文化與民主政治問題，教育政策、重點教育、以及留學政策問題，學術道德問題，現代國家的道德基礎問題，以及一般關於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的問題。著者對於中西文化造詣均深，故能融會貫通，以現代進步的眼光，討論與國家根本有關的許多文化問題。

三月十日前預約：三萬五千元
三月底以前預約；五萬元
郵費預收：掛號七千元
（多退少補）航掛二萬五千元
出書：五月

觀察叢書 6　英人·法人·中國人　儲安平著

大戰結束後，各國都混亂不安，危機日多，獨有英國，人人都在束緊腰帶，埋頭苦幹。爲什麼大家都覺得英國這個國家了不得？這就需先瞭解英國人的性格。本書重心在分析英國人的性格，並與法國人西班牙人的性格比較，最後涉及中國。中英兩國人的性格，他們做人做事的精神究竟有無相同相似之處？多年以來，英國爲一強國而中國爲一弱國，一強一弱的道理究竟何在？本書最大的興趣在解答這個問題，並引起讀者的深思。

三月十日前預約：三萬八千元
三月底以前預約：五萬五千元
郵費預收：掛號七千元
（多退少補）航掛二萬五千元
出書：四月

觀察叢書 7　論雅俗共賞　朱自清著

本書收集朱自清先生最近半年來所寫的關於文藝批評的十幾篇論文。從論雅俗共賞開始，接着論百讀不厭，逼眞如畫，書生的酸氣，站在現代的立場上分析傳統的批評用語。接着論朗誦詩，美國的朗誦詩，常識的詩，詩與話，是解釋詩介紹詩。最後論魯迅先生的雜感，和聞一多先生怎樣走着中國文學的路。每篇議論，都極深刻，而文筆樸素，風格冲淡，是一册最通達的文藝論文集。

三月十日前預約：三萬五千元
三月底以前預約：五萬元
郵費預收：掛號五千元
（多退少補）航掛二萬元
出書：五月

觀察社發行　上海（5）北四川路一九七二號內一號　電報掛號 590027

中宣部（35）利新第一三〇九號函批准登記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一一一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二五五二號